

广西第一家精神病医院在柳州创建的回忆

张童昌

解放前广西无精神病医院。直到解放后50年代初期，全省的精神病人都要送到湖南长沙或广州去诊治；流浪街头的精神病人则由民政局设收容所收留遣送。从1957年开始，柳州市在五里亭康复医院建立了全区第一个收容诊治精神病人的医疗机构，从此结束了广西不能治疗精神病的历史，填补了我区医疗事业上的这一空白。现将我在此工作的经历和见闻记述如下：

1952年6月下旬，我和新婚的妻子王经兰同志，从桂林的中南军区第三陆军医院调来柳州第二兵站医院从事内科的医疗护理工作。这个医院是把四野南下后勤部队中一些慢性病人（结核病、精神病、其他躯体器质性病及战伤外科后遗症等）集中在一起的，是收容现役军人病患者的一个部队医院。该医院1953年集体转业，由广西省卫生厅接管，并改名称为广西柳州康复医院。当时收留有一些精神失常、心理障碍的伤病员，例如精神分裂症、癔病、神经症、心身疾病、忧虑症等病人。虽为数不多，但治疗方法简单，仍以一般内科的方法来处理，例如关锁绑捆、镇静安眠等，效果不够好。

1954年，这些现役军人病者的各种慢性疾病，经过两年来的治疗，有了不同程度的好转，按情况分别给予复员、转业、遣送回乡，交给当地政府处理。医院转为收治地方慢性病（主要为肺结核及精神病人），并改名为广西省壮族自治区结核病防治院，内设结核科、胸外科、精神科。这是医院从部队到地方的一个重要转变。

1955年9月，组织上要送我到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进修学习，以便回来后开展精神病专科业务。我以满5年内科临床经验的条件入选。对这项工作我虽然还没有正确认识，思想有顾虑，但却服从组织的分配。10月份我带着广西省卫生厅的介绍信到南京报到。这是由中央卫生部委托该院开办的“高级师资”和“专科医师”两个进修班，以南京精神病防治院为培训基地，全国各省都派

有学员参加。它是我国神经精神病的科学事业发展史上新的一页。我参加“精神病专科医师进修班”学习。

学院聘请国内著名的老一辈精神病学专家来讲课，还请先进地区的专业工作者介绍他们优良的医风医德以及科学的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经验和体会。我在这一年学习过程中，业务从外行逐步变内行，专业思想从建立到巩固，对精神病人从迷惑、害怕逐渐变为同情和热爱，终于树立了为他们服务，解除他们痛苦的信心。学习结束，我决心回柳把精神病治疗工作搞好。

1956年10月，我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带着各地的先进经验回到柳州。院长王文才召集包括行政、医疗科室、后勤总务等方面的主要干部开会动员，部署重建病房、购置设备和对各级班底人员的挑选和训练等工作。会后，一边上马基建，一边陆续收治病人。原有的10多个加上新收进来的几十个精神病人在一起，吵闹、喊叫、斗殴、逃跑的事时有发生，病房秩序十分混乱。工作人员上班都提心吊胆。当时医疗器械很少，除了原有一具老式原始的交流电休克机外，再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精神病的器械。就是药品也很少。因此，我在南京学得回的一些治疗新技术也不能很好地施展。工作人员要时常在半夜外出去寻找逃跑的病号，由于工作劳累、危险，一些医务人员不安心本职工作。

正在困难的时候，医院为了开展全区首创的胸外科业务，领导上拟调我到外科工作。我要求仍留在精神科，这得到领导的同意。卫生厅谢厅长告诉我：

“给你调来一个助手一起搞。”不久，调来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神经精神科的助教刘锡伟同志，临床医疗由他和医士谢运庆负责。我则负责全面工作。一面抓医疗人员培训，一面积极争取尽快添置药品和必要的治疗器械。到1958年，一台Reiter47型直流脉冲电休克机从南京购回，继而又买回电针灸机、电睡眠机、共鸣火花发生器，还从日本进口冬眠灸针，而且买回一批药品，如广州某药厂生产的可乐静（氯硫二苯胺药片），以及休克治疗所用的胰岛素等。

1958年底精神病专科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各种休克治疗、药物治疗、理疗、发热治疗相继开展，培养了专科医务人员，积累临床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各项操作规程。柳州市人民医院罗富才院长于1956年去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专科医师进修班学习，回来后由卫生厅调来自治区结核病防

治院任副院长兼精神科主任。选送到南京学习休克治疗和工疗的李琳、黄云录同志也学成回院开展工作。以罗富才院长为首组成的精神科核心小组和全科同志齐心协力，上下一致，克服困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从1958年度起连年被评为本院和市的先进科室，还出席了市的先代会。从此，各地一批批人员接踵而来参观。

1958年“大跃进”年代，不仅收治各县民政部门送来的复员军人病人，还广收地方厂矿职工及城市居民的精神病患者。当时柳铁职工的患者几乎占病床的 $1/3\sim1/2$ 。男女病人共在一个病区活动，在管理上困难不少，加上拓展了工作范围，扩大了社会影响，一时间精神病科的名声大振，各地要求住院的来信很多，病人也不断增加，压力越来越大。但我们克服困难、坚持干，有的病人家属赞扬说“罗富才、张童昌、刘锡伟是精神病科的三个宝贝”，这话虽言过其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3个人协同全科同志的工作在社会上得到欢迎，并寄予希望。

本院在业务技术上，除了对住院病人诊断、治疗、管理、康复等例行日常工作外，还在屏山大道开设神经精神科门诊，邀全市各综合性医院专科来会诊。我每周一个上午到柳铁中心医院上班，开展专科工作（不久，因反右派运动进入批判高潮而停止）。医院还为柳州空军场站干部作定期神经系统检查，以及一年一度到南宁广西军区为选调空军飞行员体检。此外受各地政法部门委托，对犯人进行精神病法律鉴定。在教学方面，除了本科室人员的业务培训外，还要担任区卫校神经精神病科授课任务，对全区综合性医院的医师开设精神科学习班，接纳各地派来的临床医务人员到院进修，连南宁广西医学院也派医师来柳州精神病科进修。于是柳州市就成为名符其实的全区精神医学的起点、诊疗中心和培训基地。

精神病人的病历比较难写，要展开具体的叙述。一份病历常常有7至8页长，有时一天收两个病人，写病历就要到半夜，我们宁可自己加班加点，也要把病历认真写好。由于只有几个医生，每人要分管20至30个病人，除了投药施治以外，还要做认真细致的心理治疗。白天工作繁忙，晚上还要值班，睡在病房，第二天照常上班。轮流夜班是连续一周的。我们工作不计条件，劳动不讲报酬，

和肺结核混同门诊，不向上级要抗痨费。有的护理人员被精神病人厮打，甚至头破血流还继续上班工作。全科同志做到对待病人如亲人，病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受得起委屈。这样的服务态度使病人及其家属十分感动。

由于精神病是大脑的高级心理活动发生障碍而引起的，这就决定这种病在诊、治、管、护上的错综性、复杂性和社会性。诊断所需赖的是广泛、真实的信息；治疗和康复所沿用的是综合、全面的手段；护病、管理的一套方法也是要细致耐心。当时没有多少书刊可供学习参考，也还没有很内行的人员作老师请教，医疗工作像摸着石头过河，跌跤，爬起来，再摸索。“四防”工作（防毁物、防伤人、防逃跑、防自杀）经常因漏洞而出意外。经过一段时间摸索，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种常规制度，到 1974 年 10 月，由于房舍的增添，人员和装备的齐全，具备了分院的条件。卫生厅大力支持，黄征厅长指示，把精神病科从区结核病防治院分出来，成立全区性精神病防治专门机构，有 500 张病床。1980 年改名称为现在的龙泉山医院。

广西广播电视台柳州市分校的创建与发展

卢黄基 阖培柯

广西广播电视台是与中央广播电视台于1982年2月同时成立、招生的。当时在各地、市建立了电大辅导站(工作站)。柳州市也同时建立了广播电视台大学辅导站,开始进行电视教学工作。辅导站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招生、教材、考试、学籍管理和主讲教师的配备均由全国全区统一部署。柳州电大辅导站成立后由市教育局领导,站长由教育局副局长叶荣光兼任,刘南嵩同志任副站长,站址设在文惠路87号教师进修学院内。教学业务由广西电大管理。市领导部门对我市创办的电大非常重视,当时市领导潘树彬、石琪高、杨基常、谭志芳、陆万观等经常到电大检查和视察,帮助解决创办中存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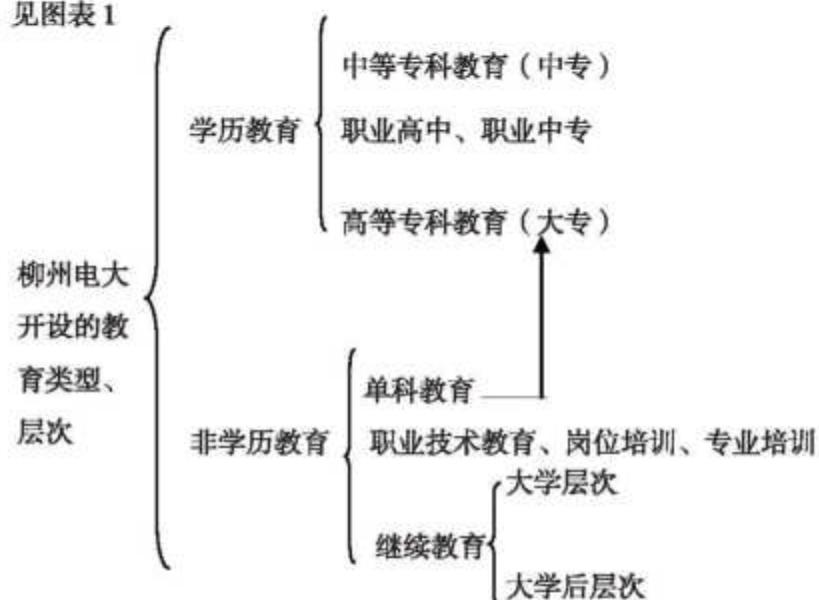
柳州电大创办是很艰苦的,开始时只有3名工作人员,3间办公室和两间教室。辅导站属于管理型,以分散办学为主,下设教学点和教学班。1979年有教学点13个,教学班18个,学生521人。1986年,教学点36个,教学班66个,学生2806人。

1984年10月4日,市人民政府批准在电大辅导站基础上建立柳州电大分校,属于处级建制,卢黄基同志担任副校长,刘南嵩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聂大中、林恒庆、赖立祥3同志任教务处副主任。分校从1985年1月1日起对外挂牌办公。市政府批准在广雅路征用10亩菜地作为校址(实际面积8.64亩)。从1985年1月起,开始进行校园建设,1985年用区里拨款20万元建起一栋教学楼。从1986年元旦起,电大分校开始在广雅路17号新校址办公。1986年开始建筑实验楼,1988年7月交付使用。1988年开始建筑教工宿舍,1990年1月启用。1992年筹建综合楼(办公和宿舍),预计1993年下半年启用。

柳州电大分校“搭架子,打基础”的任务基本完成后,1987年5月市委市政府配齐了学校领导班子,卢黄基同志任党委书记,林恒庆同志任校长(副书记),黄炳豪任党委副书记,聂大中、陈琼光、梁文任副校长,谢瑞辉任纪检

书记，黄太隆同志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分校实行教学实体，大专、中专、培训三位一体。在校专职教职工有 75 人，学生一般有 1500 多人（最多时达 3300 多人）。到 1992 年 7 月，分校已培养大专毕业生 5670 人、中专毕业生 897 人，岗位培训人员 5200 多人。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柳州电大开设的教育类型、层次不断发展。见图表 1



高等专科教育（大专学历教育）一直是柳州电大的主体。从 1979 年创理工科工程类专业开始，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开设了 3 个科类 19 个门类 30 多个专业的综合性高等专科学校。柳州电大举办的大专学历教育各专业科类见图表 2。

图表2 柳州电大举办的大专学历教育各专业科类统计

类别	理 工							文 科					经济管理				电视 师 专				
	机械工程	电子工程	电气工程	师范	轻工工程	土建工程	管理工程	医疗	电器	汉语言学	党政干部专修	法律	新闻	图书档案	政史	会计	统计	经营统计	金融	财政税收	
1979	✓	✓																			
1980	✓																				
1981																					
1982	✓	✓	✓									✓									
1983																✓	✓	✓			
1984	✓	✓	✓	✓	✓	✓	✓					✓									
1985												✓	✓	✓	✓	✓	✓				
1986	✓	✓	✓		✓	✓	✓											✓	✓		
1987	✓		✓		✓	✓						✓					✓	✓	✓		
1988			✓		✓	✓						✓	✓	✓	✓		✓	✓	✓	✓	
1989	✓	✓	✓		✓	✓						✓	✓	✓			✓	✓	✓	✓	✓
1990							✓	✓	✓			✓		✓			✓	✓			
1991	✓				✓	✓											✓	✓	✓	✓	✓
1992	✓					✓						✓	✓				✓	✓			✓

国家《广播电视台大学暂行规定》(1988年颁布)中对广播电视台的主要任务作了如下规定:举办以高等专科为主的学历教育,同时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及社会各界的职业教育、岗位培训、专业培训、继续教育提供教学服务。柳州电大分校根据《规定》精神,从1986年起设立了中专部和培训部,开设了广播电视台中专专业教育和各种培训的专业教育。中专教育情况如图3,培训教育如图4。

图3 柳州电大举办中专学历教育各专业科类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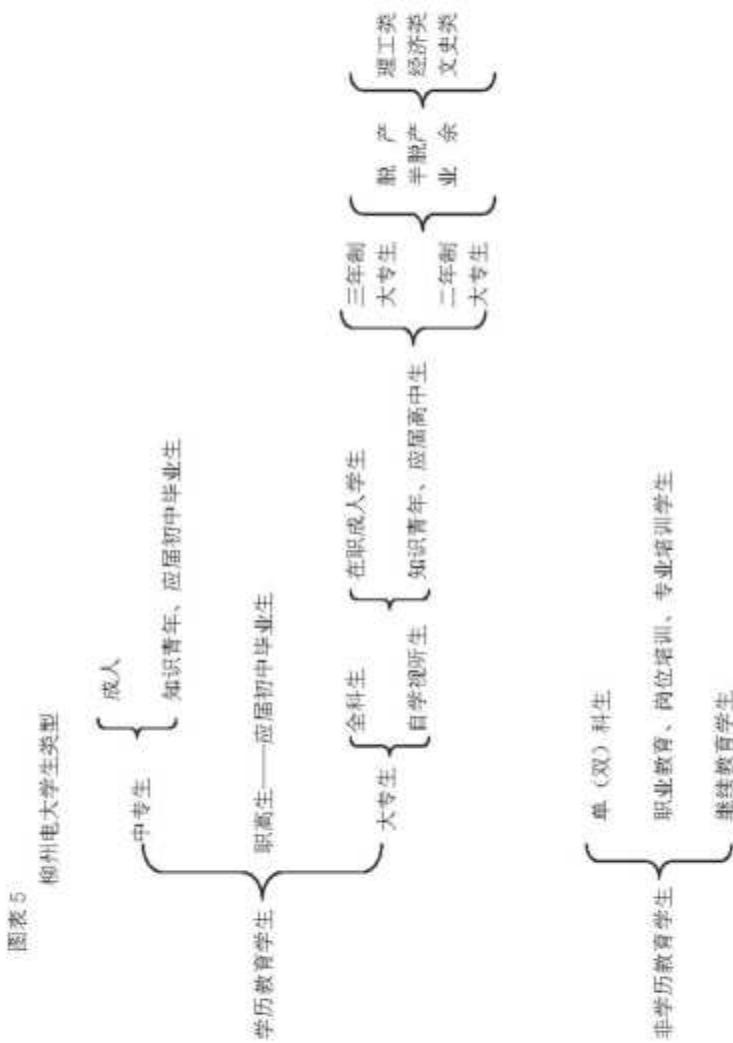
类别									
专业类别	机械	机电	工管	财会	劳经	统计	行政	保卫	职高
1986	√		√	√			√		
1987	√		√	√					
1988			√	√					
1989				√	√	√	√		
1990			√	√	√		√	√	
1991		√		√				√	
1992		√		√			√	√	√

图4 柳州电大举办各种培训专业科类统计

类别									
专业类别	升学 补习	专业 证书	家电	电工	安全 用电	锅 炉	岗位 培训	继续 教育	自学 考试
1986	√								√
1987	√								√
1988	√						√		√
1989	√	√	√	√			√		√
1990	√	√	√	√	√		√	√	√
1991	√	√	√	√		√	√	√	√
1992	√						√	√	√

柳州电大学生类型是多种多样的。见图表5。

柳州电大的基本教学环节是：（1）自学教材和完成平时作业；（2）广播（录音）电视（录像）授课；（3）面授辅导和班组讨论；（4）实验数学（理工科）；（5）期末复习、考试考查和成绩评定；（6）教学实习、生产实习和社会调查（因科类性质而异）；（7）课程设计（理工科）；（8）毕业作业、毕业设计、毕业答辩（因科类性质而异）。由于严格坚持了这些教学环节，又坚持了按需办学的原则，所以电大越办越兴旺，质量越来越高。柳州电大历年招生人数毕业人数，见表6。



图表6 柳州电大历年招生毕业人数和培训人数统计

年 份 类 别	大 专		中 专		培 训
	招 生	毕 业	招 生	毕 业	
1979	521				
1980	138				
1981					
1982	383	456			889 (单科)
1983	271	129			
1984	718				214 (单科)
1985	538	438			315 (单科)
1986	1310	707	176		
1987	571	603	159		
1988	735	1015	144		
1989	343	1714	103	176	
1990	387	235	179	159	干修 150
1991	435	631	136	144	干修 172
1992	420	373	110	103	

据 1987 年柳州电大对 82、83、85 三届毕业生的抽样追踪调查结果表明，用人单位对电大毕业生的总评价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独立思考、自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调查资料、实验操作和计算能力等方面具有大专或大专以上水平的占 90% 以上；外语阅读和笔译能力达大专或大专以上水平的占 70% 以上；得到用人单位信任或比较信任的占 90%。电大分校 13 年来，自治区和本市一共投入经费 420 万元左右（事业费和基建费等），还

接受世界银行贷款的电教设备费 8.1 万美元，已培养 36500 多名毕业生，平均培养一名学生，政府投资约 724 元。由此可见，发展电大是既快又好地培养人才、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一条好路子。

柳州电大分校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树立严谨求实，团结奋进的校风，取得优异的成绩，对柳州市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得到群众的欢迎和领导的好评。1983 年评为市两个文明建设的先进集体，1984 年评为市职工教育先进集体，1985 年和 1987 年先后被评为市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1986 年评为广西电大先进集体、市“七五”期间职工教育先进单位，1991 年评为市学雷锋先进单位。陈贻源、赖立祥同志获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从电大毕业的学生，不少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有的已担任领导职务，如柳州市对外经济贸易总公司经理朱春鹤、市水电局局长张霍德、市经委副主任钟金林、市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建林、市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匀高、城中区区长韦炳祥、市塑料制品厂厂长谢东恩等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记鱼峰民办中学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

巫邦隆

一、基本情况

柳州市民办鱼峰中学是由前身文化补习班改名建立起来的，地址在老虎冲口（现柳邕路东2巷75号）的一个小土坡上。起初，这所民办学校只有几间破烂教室，每逢刮大风、下大雨，就要立即放学回家，以保学生安全。学校不但教学设备一无所有，就连一个简单厕所也没有。学校编制只有任课老师，没有职员工友。校长又兼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名誉校长由鱼峰区委宣传部部长兼）。值日老师除值勤外，还要负责烧开水、打钟。办学的经费国家没有补助，全靠自力更生。该校学生来源都是报考公办中学的落选学生。

1962年初，一名姓薛的学校领导请求调走，市教育局委派我来接任领导工作。许多亲友知道后，都来劝我不要去接任。他们说：“民办民办，破破烂烂，要搞好，很难办。”我到任之前，曾悄悄到学校了解一下，确实，要办好这样的学校，是非常困难的。不过，过去我曾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办起工人二中，取得一些成绩和经验，这使我有决心迈开新的步伐，为党的教育事业再作出一点贡献。

二、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

学校开学后，我首先召开全体教师会议，分析学校情况，提出问题，让老师们畅所欲言，共同商讨。有的老师提出，目前学校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仅靠学生收费，最多能维持两三个月，以后怎样办？有的老师说，教育质量是个主要问题，办学就要讲质量，质量太差，有谁来读呢？经过争论，最后大家

一致认为，首先要解决经费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搞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经过大家讨论后，先是发动学生采石。由于学校离采石场（老虎冲）很近，距离不到200米，打石碴不是重体力劳动，劳动工具也很简单，学生可以劳作。于是采取学生上午上课，下午劳动的办法，结果每天每人打石碴收入两三角钱，一个月总收入近千元。这样干了两三个月，学校经费基本解决了。后来我们就到橡胶厂挖土方，还到砖瓦厂挖土推泥，又到文笔乡修公路。我们找到一个较好的办法——到磨滩挖河沙。挖河沙，由自己经营管理，自产自销，这样做学生的学习劳动也好安排，劳动经常化，收入比较多。但这是重体力劳动，只能安排二、三年级学生干，每周轮流两个班。而一年级学生则仍然继续打石碴。所得的收入除发给师生劳动补贴外，每月结余2000多元。学校有了经费，办学不成问题，教师信心增加，干劲更足了。

1964年初，自治区召开勤工俭学教育会议，鱼峰区政府派我去参加。回来后我向区政府汇报，杨区长听后说：“这次会议研究勤工俭学，提出的方法很好。你们原来这样干，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应该向南宁市‘五七’干校学习，要办工厂，搞农场，这样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才是正规化。”后来我们这样做了。为了开办农场，区政府将麻风岩附近10多亩土地拨给学校，种上蓖麻，养蓖麻蚕，又将谷埠街的一间街道小工厂（只有两台破旧的皮带车床，里面是工厂，外面是门市部和充电车间）拨给学校。为了增添设备，扩大生产，特派一名技工梅同志到贵阳、株州等地购买机床。1966年初，把工厂搬进学校，新旧机床已有10多台，用5间教室作厂房，招收技术工人50多人，派25名学生当学徒，这样全厂职工将近100人，工厂初具规模，基本上能自产自销。从此，学校的勤工俭学，已由最初简单的体力劳动进入较为复杂的机器生产的新阶段。

三、认真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

在解决学校经费的同时，我们紧紧抓好提高教育质量工作。在指导思想上，把认真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放在首要地位。努力使民办学校赶上或超过公办初中教育水平。

(一) 德育方面

德育，主要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的思想。全校老师以身作则，处处为学生树立榜样。因此尊师爱生、讲文明、有礼貌、学雷锋做好事的风气逐渐形成。许多学生自觉地利用星期天或节假日，到车站、街道和饮食店等地方进行义务劳动，多次得到群众来信表扬；有的主动为学校平整场地，维修课桌凳，打扫卫生，从而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和校风。

(二) 智育方面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逐年招聘具有大专文化水平的青年教师任教。学校经常组织教师互教共学、改革教学、总结经验，还不断表扬先进，树立榜样；也经常派出教师到公办中学观摩，学习先进经验，从而提高教学水平。

学校安排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每天早读一节，晚自修两节，让学生有充分时间做作业，而且在复习旧课的同时预习新课，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努力上好每一堂课。

为了搞好教学，教师分科分组集中学习和备课，互相检查教案和听课；学校经常举行公开课，开展各种竞赛，在竞赛活动中，学校出题，集体评分，讲究效果。公开课前集体备课，反复试教，目的是培养典型，树立榜样。在教学方法上，要求教师讲课联系实际，结合实践；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进行教学，精讲多练，讲练结合；注重启发学生的独立思维活动，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学校领导不断加强教学检查，经常下班听课，每周不少于4节；随时抽查学生作业，检查教案，没有备好课的教师不准上课。通过以上活动，提高了教学水平，保证了教育质量。在校学生成绩不断提高，毕业的学生升学率亦由原来的60%左右提高到85%以上，成为全市初中升学率较高的学校之一。

(三) 体育方面

学校每学期都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开展各项体育活动，加强体育锻炼，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成长。经检验，全校学生体育达标率在95%以上。中考体检几乎全部合格。篮球训练成绩更为突出，曾多次获得市初中男篮女篮比赛冠、亚军。乒乓球队在全市也是名列前茅，广东高州乒乓球队来柳访问时，首先在我

校进行友谊赛，我校学生连胜了几场。领队同志对我们说：“你们打得很不错，民办学校能培养出这样好的体育苗子，值得我们学习。”

四、勤俭办学，群众支持

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在抓紧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还积极大力地兴建校园，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学校南邻一口大泥塘，面积约 1000 平方米，最深处 3 米多。这口塘很不卫生，学校发动师生义务劳动，用不到两年的时间，终于挖土坡填平大塘。在平整场地的基础上，新建教室 5 间、办公室 1 间、厕所 1 间、公用厨房 1 间、教师宿舍 10 间，总共建筑面积 1300 多平方米。还抢修 4 间教室危房。1964 年初，鱼峰区政府拨款 4 万多元给学校，准备建筑 3 层 12 间教室的教学大楼。由于学校由 5 个班扩充到 14 个班，学生由 200 多人扩充到 700 多人，人数增多，场地有限，不能满足教学活动的需要，于是便想向南北相邻的航空站宿舍区和铁路宿舍区扩大校园。开始两方领导都不同意，经过争取，得到两方的支持，终于实现我们的愿望，共获得建筑面积 240 平方米，两处占地总面积约 3200 平方米，占学校总面积约三分之一。得了地块，学校完成建筑任务后，把围墙砌好，使校园完整化，面貌焕然一新，家长们看到学校有了发展，教育质量有了提高，很乐意自己的子女在此求学，因此，非常关心和支持学校的勤工俭学活动。在建校过程中，除师生们挑石头、挑河沙、挖地基、打地台（包括新建的铁路宿舍区和航空站宿舍区）外，其他工作如运输石头、石灰、木材等，都得到家长们帮忙，有的家长是单位领导，有的是司机，都主动出人出车。在整个基建过程中，除请一些石工、木工、砖工、瓦工等技术工人外，其他工作都由家长们和师生们共同完成的，为学校节约三分之一基建费。

五、在艰苦中创业，在奋斗中成长

我们逐步办好这所勤工俭学的半工半读学校，受到群众的欢迎。1964年，不少考不上高中的学生请求来校就读。由于班上座位有限，只收4名，其中铁二中2名、市六中2名。经过一年的学习，4名学生中一名考上柳高，一名考取南宁市化工学校，两名录取市一中。消息传开后，各战线和部门更加重视和支持。皮革厂主动找上门来，请求学校为他们办一个皮革专业班，经费由他们负责，每学期还有一定的经费补贴学校，专业课的老师由他们派，文化课由学校老师上，教学管理由学校负责。学制两年。经老师研究讨论，学校决定开班。1966年初，已做好一套职业班专用课桌椅，准备秋季招生。可是“文化大革命”来了，计划不能实现。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半工半读的民办鱼峰中学被冲击否定，后改为全日制的民办曙光中学。1983年又改名为柳州市第十八中学。

柳州化工学校的创建始末

杨育晞

广西柳州化工学校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办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创建于1958年8月。它受区、市双重领导，主管单位是工业厅，学校党组织和人事调配均由市委管，其他一般工作也向市委、市政府请示汇报。

1958年上半年，全国已呈“大跃进”形势，当时国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期间，把发展化学工业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化学工业大发展，便需要大量的化工技术人才。为此，自治区有关部门决定，除在南宁工业技术学校已办有的四个化工专业之外，还在柳州、桂林、梧州三个市各新办一所化工学校。

柳州化工学校建校的决定仓促，没有充足的筹备时间。校长郭子青是位年近半百的南下干部。他同几位匆匆调来的干部承担了开初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于8月底调来当副校长。当时首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校舍，马上得解决几百名学生报到后的住宿吃饭问题。市里很支持，决定把市工人俱乐部(今市工人文化宫)的四五间文娱活动室借给我们暂住。开始什么也没有，学生只好几十人挤在一间房里打地铺。过了一段时间，市木器生产合作社(今市木器厂)为我们赶制了100多张上下铺木架床，学生才免除睡地之苦。因为房屋不够用，临时在俱乐部的跳舞场旁边用竹篾搭了两间棚厂做宿舍。后来又陆续添置了一些桌椅。

柳州化工学校招生对象是初中毕业生。1958年夏季，广西工业系统的中等专业学校招生11000人，比上年多了几倍。当时广西学生来源不够，便去广东招。所以柳州化校的学生，有三分之一即将近100人是从广东的普宁和龙川两个县招来的，另有4人来自广西的全州县，其他的是来自柳州市和柳州地区一些县。学校没有派人去各地招生，而是由自治区委托两广有关地市县统一招收。我和教师艾克行受工业厅指派，曾去广东湛江把一批原来工业厅已经分配给南宁工业技术学校、后来工业厅又临时改分配给柳州的学生接了回来。这批已得

南宁工技校录取通知的学生约 50 人，他们到柳州后，见柳州化校条件这么差，又得知南宁工技校条件很好，便闹了起来，说是欺骗他们，吵着要去南宁。闹了将近一个月，经工业厅同意，这批学生最后还是转去了南宁工技校。

柳州化校的教师绝大多数是这一年刚从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如孙业芬（女）、廖德泽、陈时桐、艾克行、甘德隆、周祖骏、李家澄等都是刚从桂林广西师范学院的化学系和物理系毕业的；教数学的朱学礼，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较有教学经验的是教务主任兼教俄语的张岳天和教语文的林群英老师。他们二位从柳州市的中学等单位调来。校部一直没有设立科室，只有几个干部分管青年团、总务、保卫等方面的工作。

由于问题成堆，工作忙乱，到 9 月初还未能开学，只是组织学生到农械厂、铸造厂、砖瓦厂等单位去劳动，搬运砖头、焦炭、生铁，参加大炼钢铁。不上课，学生思想稳定不下来。于是在 9 月底把学生暂编成 6 个班先上课，开的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俄语、制图等基础课。教室是没有的，视礼堂或哪间房有空就在那里上课，有时在露天上课，晚上无法自习。工人俱乐部原来仅有供少数工作人员用的生活设施，突然来了几百人，开饭、用水、洗澡都很困难。教师也是在没有什么教学设备的条件下坚持备课、上课。当时教师和学生都理解到，这种种困难是在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大发展中难以避免的，多数人能耐心坚持，有一股热情和干劲，没有多少怨言。

为了进一步稳定师生情绪，10 月底补办了开学典礼，接着又决定划分专业，按专业分班。经请示工业厅同意，柳州化校设无机物工艺、有机化学工艺和分析化学三个专业。培养目标，是为化学工业输送初级的技术人员。分专业时，学校实有学生 294 人，共编为 7 个班，即无机专业 3 个班，有机专业 2 个班，分析专业 2 个班，各班人数都是 40 多人。

柳州化校与其他中等专业学校一样，学生不用交学杂费，而且每人都享有助学金。上级按每个学生每月 10 元助学金拨给学校，规定其中 5 角钱用作学生的集体福利，如医疗费、困难补助等，其余 9 元 5 角我们参照柳州地区各中专学校的做法，定为 10 元、9 元 5 角和 9 元 3 角等，发给学生做伙食费。学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月 32 斤。那时猪肉 8 角钱 1 斤，9 元左右的伙食标准还算过

得去。

尽管已经开学上课，但是没有自己的校舍和教学设备，学校不像个学校。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师生员工的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稳定下来。学校领导分工我管教学，还考虑到我是柳州人，一直在柳州工作，熟悉本地情况，便又分工要我管建校工作。所以我很多时间是往外跑，联系解决建校、购置床铺、桌椅等问题。我们设想过多种方案，一次又一次地去争取。但是，要现成的处所办学校的种种打算都不能实现，因此只好向工业厅请求，让柳州化校另择址新建校舍。工业厅表示同意，叫我们找好地点后再算建造工程预算，由区里拨给建校经费。我们通过市工业局取得市城建部门的支持，划了郊区白沙村旁边一块近100亩的土地，作为柳州化校的校址。这时已是1958年11月。

区里虽然答应给钱建校，但那时财政已经很紧张，钱一时不会拨下来。再说各行各业都要“大跃进”，大干快上，新上基建项目遍地开花，建筑材料非常紧缺，建筑公司根本承接不了那么多工程。为了让工人俱乐部能够正常开放，市里要我们尽快搬出去。我们向区里反映了这个情况，并说明别的办法已想尽，要搬只有往白沙搬。工业厅同意我们搬去白沙，并指示我们边上课边劳动，自己动手建校。

1958年12月初，柳州化校终于搬到白沙村，在那里租、借了几间民房，师生员工自己动手买来茅草，搭盖了几间草棚，3间作教室，2间作男生宿舍，1间作厨房。吃的米是自己用板车从城里拉回来，用的水要自己下河挑。自己动手这样干，能不能把一所正规学校建立起来？学校里有些人认为难以做到，即使能建成也不知到何年何月了。我们师生当时建校劳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打砖坯。砖坯做出了几万块，可是没有窑，无法烧成砖。隆冬来临，北风凛冽，白沙那一带地势开阔，比城里更冷。长时间在荒野泥水里劳动受不了，干了将近一个月的打砖坯劳动就暂时停了下来。这年冬天雨水又比较多，风吹雨打时间久了，砖坯终于又变成了一堆泥。这年11月中旬，中央教育部一位领导同志来柳州视察工作，同我们一批中专以上学校负责人和部分教师，在柳州饭店开了个座谈会。会上，他谈到教育方针时说，现在办的学校已大不同于从前的学校了，没有什么教室、设备，有些人认为这不是学校，我看很好，很

必要；所以新办的学校招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些，还要大办，步子还可以大。他还说，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讲了，现在这样的正规学校将来不存在了，以后工厂办学校，公社办学校；教育部、厅、局也不存在了，由工业部、农业部管教育……在此之前，我曾和本校教师孙业芬、南宁工技校校长李仕华、桂林化校副校长梁声昌去参观过浙江杭州化工学校。看了这所创办于 1953 年、已颇具规模的学校后，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认为，办化工学校必须具备“三室一厂”（即寝室、教室、实验室和实验工厂）的基本设施和一批合格的教师，否则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可能达到合格的标准，反观我们学校现状，对办好柳州化校，越来越觉得没有把握。但那位领导讲的由工厂来办学校的方法，却对我们有所启发。

于是我们向工业厅提出建议，把柳州化校合并到柳州化工厂去。因为柳化是区里的重点工程，家大业大，如果肯把我们接管过去，学校的一切问题都好解决。我们曾两次提出这个请求，区里均未答复。

从 12 月初开始，便有学生打报告要求退学，学生有各种借口，但主要原因是，他们觉得学校不像个学校，前途渺茫，不如回家另找出路。我们虽然不批准他们的要求，做了劝说工作，但有些学生去意已定，不辞而别。从 12 月中旬到 1959 年元月底，共有 20 多个学生自动退了学。与此同时，个别干部也打报告要求退职，还有一个教师请假回家，一去就没有再回来。

1959 年初，工业厅领导同志告诉我们，自治区 1959 年的经济发展方针有所调整，将以农业为主，工业着重搞轻工业，化学工业规模要收缩（柳州的柳化压缩基建投资，其他几个在筹建的化工厂都下马）；还向我们说明，全国化学工业分为 4 类地区：1 类是有较好基础；2 类是有一定基础；3 类是基础很小；4 类基本上没有基础。广西属第 4 类。而中央的方针是着重发展 2、3 类地区。广西的化工资源不清楚，也没有电，就算有了设备也无用。

柳州化校搬到白沙以后，工业厅的有关人员来视察过，目睹了师生员工的困境。我们再次向工业厅表示，目前这种局面难以继续支撑下去，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才行。1959 年 2 月下旬，自治区领导做出决定，把柳州和桂林两所化校合并到南宁工业技术学校，随即准备迁校。这时学校除了近 300 人和一些床架桌椅外，就没有什么家当了，所以在 3 月中旬，很快就完成了搬家任务。到新

的学校后，保持原来的专业和班级立即上课。柳州化工学校至此结束了他短暂的历史。4月下旬我也随迁校离开了柳州，到南宁工作。

广西第一所中等农技校在柳州创办的回忆

廖 钧

一、学校的创建及校名校址的变迁

现在柳州市北郊沙塘镇的柳州畜牧兽医学校，它的前身是解放前的广西省立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创建于1940年4月10日。它是广西省的第一所中等农业技术学校。

30年代以前，距柳州市北郊17公里的沙塘，是一片荒山野岭。当时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从桂南移民前来沙塘，成立一个农村建设试验区（又称垦村），随后又在沙塘设立广西农业试验场（即现广西农科院的前身，柳州地区农科所的所在地），意欲把柳州沙塘办成广西的农业技术中心。在1938年夏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南，广州危在旦夕之际，国民党政府趁设在梧州的广西大学被迫迁往桂林之机，又决定把广西大学的农学院，单独迁到柳州沙塘。而后，有感于农业的发展缺少技术人才，便接纳广西农事试验场场长马保之博士之建议（马保之系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之子，现在台湾任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所长），又在沙塘创建一所高级农业技术学校，定名为“广西省立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简称柳州高农）。当时柳州沙塘尚设有农林部西南区推广繁殖站，广西西江水土保持实验区及柳州沙塘兽医防治站。及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行政院又把华南善后救济分署的机耕队也设在柳州沙塘。可以说，沙塘在当时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广西农业中心。

建校初期，由广西农事试验场拨出位于沙塘街北面约3公里的苗圃地100多亩作为校址。经过一番筹建，于1940年8月便开始招收农林及畜牧兽医科第一届学生各一班，共70人。当即一面上课，一面继续建筑校舍，经过一年的时间，校舍基本落成。计有竹篱批灰墙瓦面结构的平房教室一栋，小礼堂及

办公室一栋，教工宿舍一栋，还有泥砖墙瓦面结构的学生宿舍6栋，分别命名为“柳江”“桂林”“苍梧”“邕宁”“西林”及“平乐”村。计划一个班学生住一个村。共计建筑面积2524平方米。1942年12月，沙塘乡绅陈祁昌，慨赠位于校本部东面对河的旱地340多亩，供学校建立实习农场及牧场。学校在该场又建有猪牛舍及职工宿舍。至此学校已初具规模。

1944年11月，日军侵桂，柳州沦陷。学校由校务主任余桂甫率领，疏散到融县（现融水县）达东村，继续上课。至11月中，融县县城沦陷，学校又被迫搬到融县大苗山区浦令村。此时，盗贼蜂起，交通断绝，学校被困于山区，处于极端困难之中，缺钱缺粮，政府又无法接济，学校虽千方百计勉力维持，但已无法上课。部分学生乃离校前往柳城，参加该县民团司令部的政工队，宣传组织群众参加抗日队伍，与敌周旋。1945年4月，由于生活难以维持，学校再次被迫迁往三江县良口乡。当时虽钱粮仍无着落，但幸与广西农事试验场联系上（当时试验场疏散至三江县），得试验场大力资助，才得以糊口度日。直至同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胜利后，学校才从三江迁回柳州沙塘原来校址。但大劫之后，学校损失惨重，除图书仪器和档案随校疏散外，一切均告损失，原址校舍，礼堂办公室及学生宿舍“西林”“平乐”“苍梧”“邕宁”4栋，均已被毁，瓦砾无存。其余校舍亦遭破坏，无一完整。经极力抢修，9月中旬，才勉强复课。

1949年9月，柳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由柳州南郊羊角山（现广西结核病防治院所在地）迁到沙塘街广西农事试验场场部旧址。柳州高农则迁往柳州高工的羊角山校址。直至解放后1951年2月柳州高工他迁，柳州高农才迁回沙塘街接收柳州高工的校址。

至于校名，解放后也经过几次更改。1965年，高农的林业部分，分开成立广西林业学校。1960年，学校下放给柳州地区领导，改称柳州农业专科学校（设大专班及中专班）。1962年，大专班下马，恢复由自治区领导，改为原名。1970年，再次下放，与“柳州地区共产主义大学”合并。1972年，“共大”下马，三校又复分开，改称柳州地区五七农业技术学校。直至1980年，自治区又收回领导，把农艺科并归他校，专办畜牧兽医科，改称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二、学校的编制及教职员

建校初期，校长一职由广西农事试验场场长马保之博士兼任。学校的日常校务，则设校务主任一人，代理校长处理校务。校务主任职，初由余桂甫担任，抗战胜利后，余离校他去，则由阮家骏老师继任。直至1948年8月，马保之调农林部任职，无暇兼顾本校事务，则调平乐农校校长周琪前来接任专职校长。校务主任一职，即予取消。

建校之初，设教务处、训导处、事务处、实习处、职业指导委员会、经费稽核委员会等机构。各机构设主任一人，均由专职教师兼任。教务处主管教学工作；训导处负责学生的思想、纪律及生活的管理；事务处主管学校后勤的一切工作；实习处则主管学生的生产实习及农牧场的工作。抗战胜利后，鉴于职业指导委员会及经费稽核委员会两会的职能作用不大，予以取消。

1943年，该校师资最为充足。当时广西为抗战后方，沦陷区的人员都想到广西来工作，故人才济济。全校共有教职员40多人，其中专任职教师10人，均系大学本科毕业，此外，许多科目尚聘请试验场及学院的专家教授兼课。如著名病虫害专家柳支英、陆大享、罗达新、何彦琚，甘蔗专家彭绍光、满世瑞，水稻专家张国材，林业专家刘成训，育种专家贺汉儒、范福仁及现任广西畜牧研究所所长韦文雅等均在该校兼过课。

柳州沦陷以后，外地教师大多离校他去，专职教师稍少，仅有15人左右。师资虽缺乏，但所缺课程，仍可聘请试验场专家来兼课，故依然没有影响教学的进行。在此期间的专职教师有：现广西农学院园艺系主任温扬真教授、现广西农学院林业分院院长李治基教授、现广西畜牧研究所高级畜牧师张浩荣、原柳州高中副校长刘贞藩、柳州市农科所高级农艺师廖锋以及广西农学院早期毕业生黄志元、谢廉正、覃济泽、吴增亮、王施、黄聘球、罗予供等，尚有外地前来的教师朱甲衍、陈名流、覃秉镛等均在该校任过教。

三、教学方法及内容

解放前柳州高农设农林及畜牧兽医两科，每科设科主任一人，由专职教师担任。每科学生在一年级期间，以攻读语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普通课为主，并兼修英语、动物、植物、作物通论等基础学科，目的是为学好专科学科打下稳固的基础，也可为学生今后继续升入大学深造创造条件。以后农林科必修的学科有：作物学（包括食用作物、经济作物）、作物育种、植物生理、造林通论、造林各论、树木学、森林经营、遗传学、测量学、农田水利、植物病害、植物虫害、园艺学（包括蔬菜、果树、花卉、庭园设计）、土壤学、肥料学、生物统计、农场管理等 38 种学科。畜牧兽医科必修的学科有：家畜解剖学、家畜生理、家禽学、家畜鉴别、杂生物学、家畜各论、农业概论、遗传学、家畜疾病诊所、细菌免疫、家畜外科、内科、家畜传染病、家畜育种、牧场管理、外科手术、兽医警察、饲料与饲养等。此外畜牧兽医科三年级每周尚有 2 节临时选修课，各科除专科学科外，还有体育、军训课。

教学采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方法，各学科在讲授课程以后，必与实习相结合，使学生对课程有深刻的理解。同时教师与学生组织各种学术研究会，以促进学生集体研究与自学的开展。一般每天上午在课堂上理论课，下午则到田间实习。当时农林科利用本校农场实习，种有各种农作物及蔬菜 40 多个品种，并栽有沙田柚、柑桔、桃、梨及葡萄等果树 13 种，还有 70 多个品种的花卉，及马尾松、柳杉、银杏等 14 个品种的森林苗木。畜牧兽医科利用牧场实习，养有水牛、黄牛、马、羊和鸡、鸭、鹅等畜禽，并开设兽医诊所，为群众的家畜看病。此外，学生在毕业之前，还得到外地实习一段时间，畜牧兽医科则到桂林良丰广西家畜保育所、良丰种牛繁殖场及广西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等处实习，农林科则到广西农事试验场及广西农学院实习。

当时学校办学，注重学生的质量，而不追求学生的数量。要求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要掌握真实的科学知识，具有优良的品行。规定在校期间，每科成绩均及格方能升级，如有不及格，准予补考一次，如补考仍不及格，则予以留

级；留级二次者，则以退学处理。各种成绩均及格，而品行优良者，方准予毕业。因此，一些学生，由于学科跟不上，或因生活艰苦，而自动退学的不少。学生的毕业率一般在 60% 左右。沦陷期间的学生毕业率则更低，如三班只有 28%，四班为 44%。所以该校的毕业生，大部分都能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真才实学和实干精神，深得社会人士赞赏。

教材方面，由于当时缺乏农业职专的课本，绝大部分的教材均由教师参照大学的教材自编。由于职专是三年制，所学的科目又多，实习时数也多，故教材的内容比大学教材较简略。普通科教材如语文、数学等则采用当时高中的课本。

四、学生的生活与学风

解放前柳州高农的学生，大部分是来自各县农村，故作风较艰苦朴素。学生是公费学习，不用交纳学费及一切杂费，学校每月尚供应学生每人糙米 40 斤，茶油一斤，作为伙食费。

抗战时期，每班学生住在一个“村”（即一栋学生宿舍），光复后，因宿舍被毁，只能一个年级住一个村。村内除宿舍外，尚设厨房、贮藏室及猪舍、粪坑，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每村分配有足够生产自给的菜地。每村由学生民主选举村长、生活委员、生产委员及出纳、会计、保管各一人，负责管理该村事务。村长在导师的指导下，领导全村的工作。生活委员负责该村食堂及村内清洁卫生等工作的管理。厨房的做饭及村内清洁卫生的打扫等具体工作，均由学生轮流担任（光复后，回校学生较少，学校给每村配厨师一人）。生产委员除领导学生到实习农场劳动生产外，并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到村内的菜地搞蔬菜生产，供应该村食堂的需要。每村自养肉猪数头，解决食堂的肉食。食堂所用的燃料，也由生产委员在星期天、假日率领学生上松林采集。所以学生的伙食，通过自己的劳动，基本得到解决。该村的会计出纳，则负责该村食堂的账目管理。保管员则负责管理该村的工农具及一切公物。每班尚民主推选学习委员一人，负责班内上课，实习及晚上自修的管理，并负责该班“学习园地”的出版以及各

种学术研究会的学术交流等工作。

这样，一个村就是一个班（或年级）学生的生活集体，学生的生活、学习及纪律均由学生自己管理。学校在每班只设由专职教师兼任的导师一人，也住进村内，成为该村的一员，与学生同甘共苦，对学生的生活与学习，负责指导与督促。

由于生活的艰苦磨炼，促进了学生勤奋好学的精神，充分发挥了学生们的学习与生产的积极性，学生成绩也较优异。生活虽然艰苦，但学生们友爱团结，生活过得十分愉快。学校的经费困难，也随之得到部分解决。

五、办学成果

解放前的柳州高农，由于办学条件较差，经费极端缺乏，当时社会对农业又不够重视，所以学校的发展很缓慢。尤其在日军侵华，柳州沦陷的时期，学校又遭大劫，元气大伤。在那 10 年中，除 1945 年因柳州沦陷，及 1949 年因迁校和解放前夕局势动荡没有招生外，其他各年每年也只招收农林及畜牧兽医科学生各 1 班，1 至 8 班共招生 536 名。1947 年秋，另招修业 1 年的兽医技术人员训练班 38 名。自 1943 年秋第 1 班学生毕业直至 1949 年第 6 班学生毕业（其间 1945 年因柳州沦陷缺毕业班），7 年共有历届毕业生 262 人，其中农林科 131 名，畜牧兽医科 93 名；另兽医培训班毕业学生 38 名。这些毕业生，目前遍布广西各地、市、县的科研单位、院校、场站以及各级政府机关。据初步了解，这些毕业生中，获得教授、研究员等高级技术职称的就有 20 人之多。他们潜心科学研究，成效显著，如农四班陈世生同学，对柑桔病虫害的防治和柑桔的栽培等方面的研究；张有成同学对油茶与马尾松的速生生产的研究；农三班的刘政同学对松毛虫天敌的研究；农七班庞业声同学（现广西农学院副教授）对利用同位素培育作物新品种的研究；农六班来家学同学对杉树良种的培育；农五班李荫榆同学对甘蔗良种的培育等等，都曾获得重要成果受到国家或省（区）级的奖励。其他获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同学黄家禄、陶大源、潘家盛、冼寿微、陈志群、罗诚、莫斌、黄冠基、阎峻岩、崔国祥、吴石坚、陈建宝、

梁家慰等，也曾在科技工作中作出较大贡献。还有获中级技术职称的毕业生有 21 名。

不少同学在解放以后任领导工作，如现任自治区畜牧局局长陈海云，自治区水产局副局长李贵隆，自治区人大经委副主任梁国乐，自治区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陶大源，自治区柑桔研究所所长陈世生，自治区种子公司经理潘家盛，自治区林业厅种子站副站长来家学，柳州地区科委主任黎敦良等。据不完全统计，任正副处级领导干部的有 13 人。

广西第一所林校在柳州的创建与发展

蒋 纪

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广西，林业资源丰富，很需要大量林业技术人才。但在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不重视林业教育，整个广西只设有一所“广西省立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该校只开设畜牧兽医科及农林科两个科。而且农林科偏重农业方面的课程，林业方面只讲授造林和森林经营两门课程。这很不适应广西林业建设的需要。

解放后，人民政府重视林业，加强了林业教育，1951年春就开始在广西柳州高级农业学校招收林科专业班。为了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林业建设的需要，1953年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决定筹建广西林业专业学校。先在柳州农校设立森林科，为办柳州林校搭架子，并拨专款建设柳州林校校舍，计划于1954年成立林校。

1954年7月，由于林校校舍尚未全部完工，加上教师、干部配备也有困难，只得将柳州农校的森林科全体师生从农校分出，搬到柳州市沙塘镇西北。新建的林校挂名“柳州农校分部”，人事、财政、基建等方面均由分部自己管理，并接受中央林业部和省林业厅的直接领导。中央林业部和省林业厅颁发文件拨出经费时均已直接使用“柳州林校”之名。

1955年底，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加速了建校进程，林业分部第二、第三期工程已相继完成，还购置了图书、仪器，开辟了新的苗圃和标本园。林业分部已具有一定的规模，成立林校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于是，在1956年2月5日，林业分部与柳州农校脱钩，正式成立林业学校。

学校定名为“广西省柳州林业学校”。共有学生262人，教职工42人。由郭季祥、谢维晋二人担任副校长。该校有校舍4700余平方米，实验室5个，苗圃和标本园共10余亩。

学校成立后，加快了各项基本建设，增建了校舍7200余平方米，增购了教

学仪器、图书和家具。林业厅新调配的教师、干部也陆续到校。当年秋季扩大招生，使在校学生由原有 260 余人增至 730 余人。面对学校规模迅速扩大，教学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林校于 1956 年 9 月建立学校党支部，由郭季祥兼党支部书记。加强了党对学校的领导。学校根据中央发展中等专业学校的方针和高教部颁发的《中等专业学校章程》，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加强了教学管理，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教学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1958 年 8 月，广西农学院的林学系师生从该院分出，迁到柳州沙塘成立广西林学院。院党委书记杨林（原广西平乐地委书记）、院长梁唐晋（原广西师范学院院长）。林学院共有 4 个系。林学系系主任蔡灿星，采伐运输系系主任蒋纪，林业机械系系主任张亦文，林业化工系系主任梁超，将柳州林校并为林学院的中技部。由解淑英任中技部党总支书记兼主任。1958 年到 1962 年中技部连续扩大招生，学生达 920 余人，教职工扩大到 230 余人。

1962 年冬，因国民经济调整，广西林学院停办，所有各系师生归并广西农学院迁回南宁。1963 年 1 月，原林学院中技部又恢复为林校，留在柳州沙塘林学院旧址，定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林业学校”，由原广西林学院人事处处长裴善文担任林校党总支书记，原林学院采伐运输系系主任蒋纪担任该校校长。

林校恢复以后，吸取了“大跃进”时期暴涨暴跌的教训，确定学校规模为学生 400 人，保留林业和采伐运输两个专业，加强了教学管理，教学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并于 1964 年接收沙塘林场为教学林场。

1965 年 9 月，在统一招生和统一分配的前提下，学校开始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改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林业工读学校”。并于 1966 年 1 月接收三门江林场的杨柳林场，扩大半工半读实习的基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年 6 月 12 日全校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自此以后学校受到冲击，无法上课，停止了招生。在极度混乱中，学校元气大伤。

1969 年重新成立学校党支部，由当时的军代表侯增奎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1971 年 4 月学校恢复招生并改用现校名“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学校”。1972 年秋扩大招生，从 1971 年到 1977 年共招生 7 届，838 人。招收的学生全

部实行由林场、农村推荐招收工农学员。毕业学生的分配，大部分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由于“四人帮”横行，知识分子被打为“臭老九”，教师不敢管教学生，加上工农学员文化基础差，因而这阶段的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1977年8月学校成立党委会，由郝先正、韦继清二人担任党委副书记，恢复统一招生，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为2年。1980年由曾道河担任党委书记，韦继清担任副书记，郭季祥担任校长，学制改为3年。1985年，由刘显琛担任党委书记，黄钦宁担任副书记，练耀凡担任校长，池天源、黄辉华担任副校长。招生对象改为初中毕业生，学制为4年。

广西林校创办以来历时30余年，当中虽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但不断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至1986年止，该校共有校舍31000余平方米，实验室15个，实习车间3个，苗圃20亩，教学实验林场17000余亩，教学人员有副教授2人，讲师22人，工程师3人，教员数十人。先后开设了造林、经营、林业、采运、林机、木机、林化、会计8个专业。毕业生23届，共4225人（见附表1）。从1963年以来，学校还办了短期训练班38期，培训各类林业干部2486人（见附表2）。这些历届毕业生和结业学员，遍布广西各个地区和市、县从事林业建设。该校现已成为广西培养中等林业技术人才的摇篮。为发展广西的林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以广西现有森林面积计算，该校历届毕业的4000余名学生，在广西的每一万亩森林只能分到半个毕业生。如果同广西到20世纪末林业发展的战略目标相比，更是任重道远了。

附统计表二份

历届毕业学生统计表

(附表1之1)

人数 专业 年份	合 计		林 业	造 林	经 营	采 运	林 机	木 机	林 化	财 会
	班数	人 数								
1956	2	93		45	48					
1957	1	48		48						
1958	3	112		74	38					
1959	13	488		256	232					
1960	13	497	497							
1961	没有毕 业生									
1962	9	275	90			55		61	59	
1963	8	261	120			103			38	
1964	3	101	73				28			
1965	没有毕 业生									
1966	没有毕 业生									
1967	3	100	64			36				
1968	3	123	82			41				
1969	5	198	158			40				

(附表1之2)

人数 年份	专业	合 计		林业	造 林	经 营	采 运	林 机	木 机	林 化	财 会
		班数	人 数								
1970	没有毕 业生										
1971	没有毕 业生		45								
1972		1	45								
1973	没有毕 业生										
1974		5	199	119			80				
1975		3	103	34			69				
1976		3	118	80			38				
1977		4	162	84			78				
1978		4	155	79			76				
1979		1	32	32							
1980		7	297	131			166				
1981		5	186	111			75				
1982	没有毕 业生										
1983		4	158	77			41				40

(附表1之3)

人数 年份	专业	合 计		林 业	造 林	经 营	采 运	林 机	木 机	林 化	财 会
		班数	人 数								
1984		6	236	155			40				41
1985		6	238	157			40				41
总计		112	4225	2198	423	318	978	28	61	97	122
附：农校林科、林业分部毕业学生数											
1954		1	24	24							
1955		2	80	80							
总计		3	102	102							

历年结业短培训班学员统计表

(附表2之1)

序号	办班时间	培训内容	培训对象	结业人数
1	1963年上半年	财务会计	林业系统财务人员	80
2	1963年下半年	财务会计	林业系统财务人员	80
3	1964年上半年	木材检尺	林业系统检尺员	130
4	1973.9—1974.1	林业基本知识	公社林业助理员	46
5	1974.4—1974.11	汽车驾驶与修理	招工	180
6	1974.6—1974.8	木材检尺	林业系统检尺员	79
7	1974.9—1974.10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职工或社员	35
8	1974.9—1975.1	财务会计	林业系统财务人员	67
9	1974.11—1975.1	木材检尺	林业系统检尺员	75
10	1975.4—1975.6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职工或社员	46
11	1975.6—1975.8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职工或社员	41
12	1975.9—1975.10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职工或社员	45
13	1975.11— 1975.12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职工或社员	39
14	1976.4—1976.6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职工或社员	69

(附表2之2)

序号	办班时间	培训内容	培训对象	结业人数
15	1976.7—1976.10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职工或社员	70
16	1976.8—1976.9	马列主义常识	区直林业单位党支部宣委	79
17	1976.10—1977.1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职工或社员	65
18	1976.11—1977.1	木材检尺	林业系统检尺员	95
19	1977.3—1977.5	木材架空索道	林场干部工人	26
20	1977.6—1977.10	木材架空索道	林场干部工人	40
21	1977.6—1977.8	油茶有关知识	油茶基地职工	39
22	1977.8—1977.10	木材识别	林业系统干部职工	62
23	1977.9—1977.10	林木良种	林业技术干部	34
24	1977.10—1977.12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技术骨干	40
25	1978.3—1978.5	财务会计	林业系统财务人员	120
26	1978.6—1978.8	财务会计	林业系统财务人员	120
27	1979.8—1979.10	财务会计	林业系统财务人员	39
28	1979.8—1979.10	林木种子检验	林业技术干部	120

(附表2之3)

序号	办班时间	培训内容	培训对象	结业人数
29	1980.9—1981.1	林业基本知识	县林业局长	36
30	1981.3—1981.7	林业基本知识	县林业局长、林场场长	67
31	1981.9—1982.1	林业基本知识	县林业局长、林场场长	76
32	1982.3—1982.7	林业基本知识	县林业局长、林场场长	71
33	1982.9—1983.1	林业基本知识	林区公社书记或主任	57
34	1983.3—1983.7	林业基本知识	林区公社书记或主任	79
35	1983.9—1984.1	林业基本知识	林场场长	36
36	1983—1984	香菇栽培技术	有关单位职工	47
37	1984.3—1984.7	林业基本知识	林场场长	26
38	1985.9—1985.11	林区公路施工	林场公路施工员	30
	合计	三十八期		2486

广西大学学生促校返梧运动的回忆

沙君涛

1946年春，发生在柳州的西大学生促校返梧运动，是广西大学历史上一次很有意义的重大事件。我作为当时法律系一年级学生，有幸参加了这一运动。42个年头过去了，现在回顾起来，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1945年秋，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当时的国立广西大学从流亡地贵州省榕江搬回广西，在柳州的鹧鸪江搭些茅草棚暂时栖身。随校一起流亡和各年级回来复学的同学，以及新招收的一年级同学，加上教职工及家属近千人，拥挤在十来间大草房里。同学们睡的是上下架床大平铺，宿舍里的过道只能一人通行，吃饭是在露天，有时上课也在露天，更不用说什么实验室、图书馆了。鹧鸪江当时四周都是光秃的土岭，距柳州市区10来里，往返全靠步行。这样的地方显然不适宜办大学，何况当时西大还是一间颇有名气的国立大学，是广西的最高学府。经过8年抗日战争的锻炼和洗礼，同学们在生活上艰苦一些是受得了的，但是学习条件和设备如此的恶劣简陋，对学习不利，因而不能忍受，很自然大家都十分迫切要求迅速摆脱这种困境。

广西大学应该搬到哪里去？广大师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在关心和议论这个事情。当时有几种意见：一种是要搬去桂林。这主要是广西当局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的意见。理由是桂林是广西的省会，西大设在桂林既能繁荣战后的桂林，更便于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直接监督管理。另一种意见是搬去梧州，这是绝大部分师生的意见。理由是梧州有现成的原广西大学校址，房舍充足，环境幽美；而且梧州地近港粤，交通方便，易于接受外来文化，少受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当局的直接干涉，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另外，去桂林没有现成的校舍，要新建校舍需要大批钱物，且短期内也不能建成，从节省国家财政开支看也以去梧州为好。也还有另一种意见是在鹧鸪江原地建校，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多，也提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

广西大学究竟搬往何处，由议论而争论，由争论而行动。终于爆发了历时半年多的西大促校返梧运动。在校内经过广大师生充分讨论酝酿，成立了以法律系三年级同学叶昭南、经济系三年级同学马曜元、政治系二年级同学李腾驹等人为首的促校返梧委员会。委员会集中同学们的意见，统一领导和指挥大家的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即发出通电宣言，吁请国民党政府和社会同情支持，并派出代表到各地向有关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陈述理由，争取支持。现任我国农业部部长的何康同志，当时是西大农学院学生，就是派往南京重庆等地活动的代表之一。

同学们当时也知道，搬校返梧，尽管有一百条一千条理由，于国于民于学都有好处，但是阻力仍然很大。因为搬校回桂（林），反对迁梧（州）的主要支持者是国民党广西的最高当局。他们权高势大，而且十分顽固，不经过一场激烈的较量和斗争，没有广泛的社会支持，要达返梧的目的是很困难的。当时全国的形势是抗日战争刚胜利结束，中国正面临两种命运的决斗：全国广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则坚持内战独裁。青年学生对于时代的脉搏最为敏感。当年发动的这场促校返梧运动，表面上是要求改善生活学习条件的福利斗争，实际上则是以它特有的形式成为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潮流中的一股支流，是全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运动的领导机构已成立，校内外的舆论已相当强烈，返梧的行动如箭在弦，势在必行了。同学们雇船租车正准备离开柳州，向梧州进发，可国民党柳州专员公署却下令查封所有雇请的车船，一律不准西大学生离柳。他们这一无理横蛮措施，激怒了热血沸腾的西大学生。1946年2月27日，同学们就由鹧鸪江步行到柳州，在柳州市区游行示威，向市民宣传返梧的合理主张，揭露当局扣留车船封锁交通的专横无理行径。游行之后几百名同学围坐在国民党柳州专员公署门前。当时国民党柳州专员莫树杰，国民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及国民党政府中央教育部督学童大坝正在柳州，同学们要求他们出来接见，当面回答问题，明确取消封车扣船的禁令，不达目的誓不离去。国民党当局对于同学们的正义要求竟然置之不理，而且在专员院内布岗设警、荷枪实弹，准备实行武装镇压。可是同学们也坚持斗争，绝不妥协后退，几百人忍饥挨饿静坐在专员公署门前，

通宵达旦，并且不间断地对围观群众进行宣传。国民党当局迫于群众的正义压力，终于不得不答应同学们的要求，取消了封车扣船的禁令。这一场初步较量，以西大同学的胜利而告终。

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与国民党官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在柳州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次行动不但震动了柳州，也震动了全广西。它使人们看到群众的力量不可侮。

游行示威取得胜利后，3月间参加返梧的同学们包乘近百艘木船由柳州出发，沿柳江顺流而下，浩浩荡荡直下梧州。沿途停靠码头口岸时，同学们均上岸对群众进行宣传。抵达梧州后，即住进蝴蝶山原广西大学旧址。这处校舍是马君武校长在任时建造，钢筋水泥结构，坚实高大的一栋栋楼房，分布在美丽的鸳鸯江畔的蝴蝶山顶山腰和山麓，各栋楼房之间修有水泥路互相连接。从梧州市区渡鸳鸯江上大学码头，有一条宽阔的林荫马路，人称“大学之道”，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竹修，确是一个使人能潜心治学的好处所。

同学们到达梧州后，除继续派代表外出活动及组织宣传队伍经常向梧州市民开展宣传外，大部分时间则组织人员起来进行自学，在坚持返梧运动的斗争中进行自我教育。当时各种学术性的社团组织有如雨后春笋成立起来，如经济学会、政治学会、法律学会、土木工程学会、布谷社、十二月社等等。“大学之道”上出现各社团编辑出版的墙报，种类繁多，琳琅满目。梧州的市民学生成批到来参观阅览。这里展现了同学们的自学成果，同时也成了当时梧州著名的民主文化走廊。

由于国民党广西当局的顽固坚持，国民党中央政府听从李、白、黄的意见，不支持广大师生的合理要求，坚持要广西大学迁往桂林。形势急转直下，再僵持下去将会给同学们带来不利。在运动中经受锻炼的西大同学，不但学会在有利的形势下组织进攻，也学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组织退却。同学们在梧州坚持三个多月后，于1946年6月间撤离蝴蝶山返回桂林，全体同学遵守纪律，团结振奋，没有丝毫失败的灰溜溜情绪。

促校返梧的目的最后虽然没有实现，但作为全国学生民主运动一部分的西大促校返梧运动，在更高的层次上则取得了成功。第一，它提高了广大学生的

政治思想觉悟；第二，培养锻炼了同学们的革命意志和斗争艺术；第三，涌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学生骨干。这些都为后来西大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输送大批干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当年一起共同奋斗的同学，很多人先后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现在不少人都已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

我想，在广西大学的史册上，应该记下这光辉的一页。

柳州市成人教育发展概述

(1908—1988)

陈卓子

柳州市成人教育，据目前可考文字资料，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间。当时柳州知府在城厢昭忠祠试办“普通民众识字所”，招收80名成人入学，规定要学会了1000余字才能结业。入学成人有工匠、农民、市民，暂不收妇女。工匠和农民入学免收学费。该所办了多少期，何时停办，目前尚无文字资料可查。

到中华民国时期，继清代进一步以社会教育、民众教育、贫民、劳力教育等名目，实施成人教育。其中有官办、社会力量办，内容与形式多样。民国4年（1915），马平县（柳州前名）遵照当时民国政府教育部下达关于要求各省举办社会教育的通令，设立图书馆，开展通俗演讲，进行以成人为主要对象的社会教育。民国10年前后，因军阀混战，社会动乱，此项教育一度停顿，直至民国13年（1924），战乱平息，社会教育逐步恢复。随着当时全国工农运动的兴起，柳州社团主办的成人教育甚为活跃。民国15年间，柳江道学联在城区省立第四中学创办贫民夜校，招收200余名城区贫苦的中、青年人学，学联会委员长陈振尧为名誉校长，聘请四中一些学生为义务教员。夜校学生的书籍、文具概由学联向社会募款购买供给。同年9月马平县妇女协会在中共柳州支部领导下，继之开办一所妇女夜校，招收80余名贫苦妇女入学，由四中女生杨秀春为夜校主任。课程以识字为主，同时亦开课宣传妇女被压迫、被剥削，遭受各种不平等待遇，要求解放的道理。同年11月中共柳州地下组织，为向工人宣传革命真理和传授文化知识，党员张胆在城厢斗母宫（今龙城路邮局附近），又创办一所劳工夜校，招收近百工人和小贩入学。主讲教员为张胆、刘策奇。四中一些进步学生被聘为义务教员。至是年冬，北关外农民协会成立，又在雷王庙（今解放北路地区电影公司）协会地址内，开办农民夜校，招收农民，学习革命道理与文化知识。义务教员有曾参加广州农讲所学习的谭均任及共青团员陈秉森等人。民国16年（1927），中共柳州地下党员又在雷王庙新办一个农民运动训

练班，主要任务是培训农民运动骨干分子。参加学习的有 140 余人。学员的书籍、文具均由班免费发给。此外，还免费发给每人一套灰色粗布制服。学习内容为：《农民运动指南》《海陆丰运动》《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主要教员为省立四中的教员。不久，随着全国工农运动形势的变化。在民国 15、16 年间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社团所主办成人（工农）教育受影响而停顿。

民国 21 年（1932），柳州县开始创办县立民众学校，校址设在二圣庙（今金鱼巷前）。县教育局长兼校长，首届入学学生 60 余人，以识字教育为主。识字课本由教育局供给。同年，又设立以民众教育为任务的县立民众图书馆和县立通俗演讲所。演讲所附设在公园路县立民众图书馆内（即今柳州市文联地址）。演讲所对象是民众（主要对象是成年工人、农民、市民），教育计划性颇强。每月定期、定点（沙街、总商会门口、东门、小南路、五显码头等地）、定时（晚上 6 时至 8 时）、定演讲员向民众作通俗演讲。演讲内容，按照当时广西省所规定，有鼓励爱国、劝勉守法、增进道德、灌输常识、提倡实业、注意体育卫生等方面。以是年 2 月份的两次演讲内容为例，有：“班超以身救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国”“东北八义士”“壮士李杜”“马占山全节反正”“见义勇为”“民权初步”“劳动神圣”“英灭印度”“注重劳动事业”“五十年后之新世界”“人类的未来”“注重卫生”等等。听讲群众，每晚最多达 200 余人，最少亦有 60 余人。此项通俗演讲，坚持了两年多。至民国 22 年，据柳州县有关民众（成人）教育的情况统计：民众教育馆 1 所，工农业余小学 38 所，38 个班，教职工 38 人，学生共 740 人；扫盲班 42 个，教职工 42 人，学生共 627 人；民众学校 10 所，22 个班，教职工 28 人，学生 1374 人；补习学校 1 所，学生 80 人。此外还有通俗演讲所、书报阅览室、民众写字处等等。这些多渠道、多形式的成人教育，在当时收到一定效果。民国 25 年（1936）以后，全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柳州成人教育处于停顿状态。

1949 年 11 月柳州解放以后，柳州市成人教育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从干部、职工、农民、市民扫盲（识字）、初等文化补习教育开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1950 年初，柳州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订的《共同纲领》关于加强劳动者及在职干部业余教育的要求，以及建国初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关于重视工农教育，开展扫盲（识字）教育及工人文化补习的精神，市文教局（后改称教育局）成立工农教育科，市政府成立扫盲委员会，作为专门领导机构，将全市成人分为干部职工、农民、市民三大系统，开展扫盲识字及初等文化补习的成人教育工作。在城区，职工教育方面，这一年的8月，第一人民文化馆率先开办第一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随后，第二、第三人民文化馆开办第二、第三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市自来水厂开办为本厂职工补习文化的职工业余学校。这四所学校共有学生885人。学习期限，文化班为4个月，另有一个艺术班为一年。市民教育方面，从这一年3月开始，市人民政府在河北、河南两个片开办了以识字为主的市民业余文化夜校各一所，入学市民（大部分为家庭妇女）100余人。其后各条街道先后办起了扫盲识字班或妇女文化学习班。在郊区24个行政村及一条街，以土改区为重点，开展扫盲识字的冬学运动。男女分班，两个月为一期。

至1951年，工农成人扫盲识字、初级文化教育有了新的发展。从这年5月起，市厂、场、企业单位相继成立本单位的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市厂、场、企业主办职工学校增至4所，学员增至2078人。市一、二、三文化馆主办的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改由市文教局主办，增至38个班级，学员增至1482人。9月，市人民政府新创办一所为工农干部提高文化开的业余文化学校，4个班，学员128人。柳州铁路分局又新创办5所职工业余文化学校，学员3223人。据统计，这年参加文化学习的职工约占当时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在郊区方面，市人民政府组织农民教育工作队深入乡村动员农民入冬学，这一年组织成立了冬学业余学校6所，在15个村屯中成立学习班（组）共4164个，参加人数达2861人，约占郊区人口总数的11%左右。

1952年全市开展速成识字运动以后，城区成人教育发展迅速。是年市办及厂、场办职工学校发展至17所，学员6630人（不含铁路），文化层次上升到初中。1953年市政府在河北、河南两片新创办第一、第二职工业余中学。原有两片的职工校改名为第一、第二职工业余初级学校，原有初中班全部拨入职工中学。厂、场、企业主办职工校作了调整，除农械、柳机、铸造、锌品、水电、染织、空压、木材等较大企业独立自办职工学校外，为照顾小企业，按手工业、

建筑、搬运等系统开办联合职工学校，分别称第三、四、五职工业余学校。这一年市民教育已有 36 条街先后开办起文化学习班，市民文化层次亦上升到初中。郊区农民教育自 1952 年始，由冬学夜校（班），转入常年夜校（班）。至 1955 年，城区有干部学校一所，职工学校 13 所，在学学员 6400 余人；市民文化学校 9 所，在学学员 2159 人。郊区参加学习农民达 4800 余人，有不少农民经过学习，懂得记工分或订简单生产计划。

1957 年“反右”，柳州成人教育曾一度滑入低谷。1958 年“大跃进”开始，职工业余教育走出低谷，继 1953 年走向高峰。1958 年，全市职工业余学校增至 35 所，学员增至 11275 人。政府办职工学校作了调整，将市干校、市第一、第二职工中学和市第一、第二职工初级学校合并，总称为市职工业余文化学校，校址设在文惠路今市十二中处。到 1959 年，有不少厂、场、企业单位增设了政治、文化、技术三结合的职工“红专”学校。是年，职工校与“红专”学校共有 56 所，学员 24365 人，占办校单位职工总数的 51%。1960 年职工校与“红专”校增至 198 所，（含车间“红专”校分校），入学职工达 57632 人，占应入学职工数的 82%。文化层次逐步提高，开始出现中专班与大专班。

1961 至 1962 年间，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城区郊区工农教育处于停顿状态。其后经济好转，工农教育曾力求恢复。可是接着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全市所有工、农、市民业余学校，从衰落而至完全停顿。

1971 年，遵照国务院有关扫盲的指示，全市进行一次文化普查。接着城区各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和郊区各人民公社先后开办政治夜校。城区、郊区人民公社夜校致力于扫盲识字教育，而企事业单位夜校除扫盲识字教育外，开始着重向中、高级文化技术教育发展。1972 年，部分厂场响应毛泽东“七·二一”指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纷纷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此类大学到 1975 年已达 18 所。其中较有规模而较正规化的有区建五公司、柳钢、开关厂等单位办的几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新形势的到来，加强了干部职工、农民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的培养，从 1979 年起，城区干部职工教育在基本扫除文盲基础上，朝着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进一步发展。是年统计，全市有 146 家

厂、场均开展了职工业余教育，参加学习的干部职工共 18000 余人。有扫盲班、识字班、小学班、中学班、中专班、大专班以及各种技术（电工、制图、机械等）培训班。此外，市总工会与市教育局联合在市内各中学开办职工业余文化夜校，共有 19 个分校，72 个班（含中、小学班、专业班），学员 3669 人。1981 年区建五公司、柳钢、开关厂的“七·二一”工人大学，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改称为职工大学。为加强干部职工教育领导，是年成立柳州市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这是一个常设机构，委员会下设有办公室，配备专职干部。1984 年，市教育局工农教育科改为成人教育科。市教师进修学校、市电大辅导站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分别改称为市教育学院、广西电大柳州市分校。是年全市开始成人高等自学考试，有 900 余人参加，至 1988 年增至 6000 余人，1985 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批准，国家教育委员会备案，由市总工会主办的柳州市职工大学正式成立。此外成立的大、中专院校还有广西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柳州分校、市科技进修学院、市第一业余中等专科学校等。从 1979 年以来，市职工教育向大专层次蓬勃发展，至 1985 年统计，全市已有党政机关、厂、场、企业、社会力量办的成人大专院校（班）9 所（个），成人中专学校（班）12 所（个）（不含民主党派及社团办成人专业学校培训班），参加学习学员计有 5000 余人。

农民教育方面，自 1981 年郊区经市人民政府全面检查验收成为脱盲区之后，各乡村在完成扫盲任务基础上，开始办起各级各类农民业余文化学校，转入成人教育提高阶段。至 1984 年上半年统计，全郊区有 2611 名农民入简易小学、中学、初级农技、实用文化等班学习。至 1986 年统计，市一郊（区）两县（柳江、柳城于 1984 年下半年划入柳州市）的 32 个乡镇 304 个村，已有 30 个乡镇 135 个村开办了文化技术班 362 个，参加学习的农民共有 1351 人。

1987 年 6 月，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明确了成人教育的任务。柳州市根据《决定》，进一步开展对走上岗位的工人、农民、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其它从业人员的岗位培训和定向培训，在职成人知识更新、扩展、补缺的教育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是年，在城区有 3100 余名技术、管理人员参加中级技术培训，4900 余名班组长参加班组长管

理知识培训，2700余名中青年干部参加高中以上学历培训，6067人参加高等教育。在两县一郊各乡（镇），进一步开办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提高农民科学技术知识。至1988年，乡（镇）办的达34所，村办的达227所，参加学习的共76186人，柳州成人教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解放后柳州山歌活动概况

张绍伯 于辉云

鱼峰山下搭歌台

唱山歌，是柳州壮族人民民间传统文艺活动的一种形式。解放前壮族男女青年多以唱山歌求偶。解放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柳州山歌发挥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作用。它日益繁荣。

1952年《人民日报》报道，国家领导人邓子恢同志在深入农村指导土地改革工作中，组织当地民歌手用唱山歌配合土改宣传，推动了土改工作的开展。柳州文化部门受到很大启发，随即培训本市山歌手，组织山歌队伍，并发动他们用山歌的形式来配合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解放后柳州山歌宣传活动，最初是在各文化馆门前设立宣传阵地进行，如曾在第二文化馆（原在河南驾鹤西路柳江浮桥河南大码头，现市食品公司处）门前，用旧乒乓球桌搭起平台，安上电灯和扩音器，每逢圩日、节日或假日，就请山歌手来登台唱山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心工作，听众很多，有的到晚上10点多钟还不肯离去。由于场地小，听众多，影响交通，根据歌手们的意见和听众的要求，即把阵地移到鱼峰山下、龙潭边去。鱼峰山是传说刘三姐唱山歌成仙的地方，山歌手们常到这里对歌，在这里摆设阵地，别具一番风采。柳州山歌活动的日益发展，对群众影响越来越大，山歌手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山歌宣传队伍中来，到1954年，已发展为群众性的山歌演唱活动。活动面越来越广，在一次中秋山歌会活动中引来了来宾、象州、河池等县的歌手和听众。柳江、柳城、来宾等县与柳州民间的山歌活动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

党的恩情未唱完

在 10 年“文化大革命”动乱中，柳州山歌活动被冲击、禁锢，连鱼峰山上新塑造的歌仙刘三姐塑像也被拦腰斩断。不能唱山歌，对于山歌手们来说，是非常难过的。不准唱山歌，他们也要唱。许多歌手和山歌爱好者暗中互相串联起来，偷偷地唱。歌手们不得唱歌殊感不平。如老山歌手韦成勋，因唱山歌被批斗，但在批斗后却继续唱起山歌来：

难了难
我唱山歌遭大难，
肚中有歌不准唱，
党的恩情未唱完。

韦成勋被批斗后，越想越不通。他伤心过度，竟将一双老眼气瞎了。直到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韦伯才撑着拐杖从家里一步一步走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韦伯听歌友们说，鱼峰山下、江滨公园里又恢复唱山歌了。他非常高兴，但又半信半疑，一天，他拄着拐杖摸到江滨公园的竹林中细听，是不是真的有人唱山歌。当他真的听到久未听到的歌声时，便独自欢唱起来：

久旱望得春雨来，
听唱山歌喜开怀；
不准唱歌气瞎眼，
得唱山歌眼才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山歌得解放，大大地激发了山歌手们唱歌的积极性，柳州山歌活动更加活跃。

山歌迎客心连心

1980 年盛大的中秋歌会后几天又是国庆节。这期间，鱼峰山下、龙潭边开展大规模的对歌活动，听歌者人山人海，气氛热烈。此时，正值全国 1980 年

度秋季物资交流会在柳州市召开，从全国各地来参加交流会的宾客 2000 余人汇集龙城。宾客中大多数是初次来到柳州的，但不少人早已听到柳州有个刘三姐唱歌成仙的传奇故事，又得知柳州人常年有对唱山歌习俗的趣闻，因此他们纷纷前往观赏，并慕名瞻仰歌仙刘三姐塑像。但由于语言不通，大会接待处便邀请市文化馆张绍伯同志做向导。于会前一天的下午，宾客们来到鱼峰山下，龙潭边的歌声早已此起彼伏。一簇簇人群围着一对对歌手，龙潭边的凉亭里歌手们正在对歌，听众坐得满满的。当笔者与一部分代表挤进亭子里时，有的听众即站起来让坐。这时，从外地前来对歌、排坐在岸边的两个大苗山女妹仔却唱起了引歌来：

柳州有座鱼峰山，
山下有个小龙潭，
山上山下样样有，
就缺芙蓉配牡丹。

接着就是两个后生仔，兴趣勃勃地伸出头来，对唱道：

昨夜三更得个梦，
柳江涨水满咚咚，
上河飘来“刘三姐”，
弯船来到鲤鱼峰。

此时，岸边那两个妹仔会心一笑。原来她们发现，这两个后生仔正是去年到大苗山寨和她们对过歌的柳州仔哩，于是得意地唱道：

妹是高山好木材，
滚下山脚八人抬；
皇帝用我做门扇，
大官小吏不敢挨。

这是一首老情歌，怎样答，很棘手。那两个后生仔正在找歌来回敬妹仔时，老山歌手韦成勋却急着帮腔来：

打把金斧游京街，
我是鲁班下凡来；

皇帝请我做门扇，
任我锯来任我裁。

但是，那两个年轻仔很自信，认为那两个妹仔不是对手，因而劝韦伯不用帮腔：

老人家，
后生唱歌你莫答，
你是老姜留做种，
我们子姜争暴芽。

唱到这里，我们向宾客讲解歌词大意。客人听了连声称赞说：“唱得好！唱得好！能找出这样生动形象的东西来作比喻，真有意思！柳州的山歌内容太丰富多彩了。”那两个后生仔激情难止，又唱道：

那天融水见了妹，
害我魂魄满天飞；
请了七个道师佬，
喊了九天魂不回。

两个妹仔，逗情之余，故意挖苦：

妹在一边哥一边，
只想唱歌不想连；
哥若单思魂魄散，
死到黄泉鬼可怜。

你一唱，我一答，热火朝天。这时，笔者为缓解这逗情的局面，便向歌手介绍外地来的客人，请歌手们用山歌来欢迎远道而来的宾客。话音刚落，歌手们争先恐后唱起欢迎山歌：

代表贵客到柳州，
物资交流情交流；
买得山歌土特产，
来年发财转回头。

当唱到“转回头”三个字时，宾客们喜笑颜开，特别高兴，连声说道：“柳

州山好水好歌更好，我们心连心，不会忘记这优美的山歌之乡！”四川省的几位客人走过来，热情地紧握着老歌手韦成勋的双手问长问短，问道：“老前辈，你唱多少年山歌了？”韦伯点头微笑，随着以歌回答：“讲唱歌来欢喜多，好比天天舀水喝；天天山歌不离嘴，喝水还少歌还多。”宾客们听了，一阵热烈鼓掌称赞说，唱得好，唱得好！客人们与韦伯紧紧地握手，然后与歌手听众们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中秋佳节山歌会

按照壮族民间在中秋节兴唱歌的习俗，根据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市文化主管部门定于每年中秋节举行山歌会。从 1961 年举办首届山歌会以来，坚持每年一届。每年观众都达万人左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 1980 年举办的中秋山歌会最为盛大，影响很广。当时，以鱼峰区为中心，在河南片、河北片分别搭起了 11 处山歌台，开展唱歌和对歌活动。歌会延续 3 天 3 夜。参加歌会的有来自柳州地区的来宾、象州、金秀、融水、三江以及河池地区的宜山、河池县，桂林地区的阳朔、灵川、临桂等县的壮、汉、瑶、回等民族的歌手 90 多人以及一批观众。还特邀了融水、三江县的苗族、侗族芦笙队到大会踩堂表演联欢，热闹非凡。

山歌喜迎专家来

柳州市开展的山歌活动，得到国家领导人和专家的好评和支持。在 1963 年举办中秋山歌会时，国家领导人郭沫若亲临指导。郭老热情洋溢题词留言鼓励。1958 年“三月三，壮族歌节”活动在柳州举办，中央文化部高占祥部长亲自到鱼峰山下听歌，并赠送题词留念。词曰：“阳春三月三，歌满鱼峰山；龙城飘艺彩，乐舞颂丰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副主席贾芝、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王健、湖南省民研会秘书长陶年、作家贺振扬、湖南省出版社编辑归秀文、中央电视台摄影师金伟良以及上海、广西出版社领导等，都曾前来对

柳州市的山歌活动进行视察、研究和指导。港澳台回国观光团有近百名贵宾也曾到歌会进行联谊观赏。1978年12月，一位日本文学摄影专家，专程来柳研究柳州山歌。

柳州山歌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在领导和专家的支持指导下，在歌手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不但新歌活动的开展十分活跃，对传统民歌的发掘整理工作亦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为彩调剧《刘三姐》的创作和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作出一定贡献。其中韦成勋、李春华、周子钩、黄月姣等一批优秀的老山歌手曾提供了许多民间流传的刘三姐故事和山歌素材。彩调剧《刘三姐》中的谜子歌、抗婚歌和与秀才对歌的传说故事，不少资料亦由他们提供整理出来的。

柳州市 50 年代初期的社会文化活动见闻

于辉云

柳州市人民文化馆(前身为人民教育馆)于 1950 年 4 月建立,是柳州市解放后最先设置的文化事业单位。它的任务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科学文化水平,普及国民教育,积极开展全民社会文化工作。

人民教育馆,是由市军管会于 1950 年 1 月 3 日正式接管柳江县图书馆后建立定名的,馆长董咸熙(原图书馆馆长),副馆长马天禄,下设宣教、文娱、图书阅览和总务四个组。1950 年 8 月,市人民政府根据广西省文教厅有关规定,将原文化馆更名为第一人民文化馆,分别在一区(屏山区)、三区(柳西区)增设第二、第三人民文化馆。市人民政府任命:第一人民文化馆馆长董咸熙、副馆长肖若松(馆址设于公园路 24 号原人民文化馆处);第二人民文化馆副馆长肖声和(馆址设于一区河南驾鹤西路原七、八联小校址);第三人民文化馆副馆长何纪明(馆址位于三区中山西路原柳西镇小学处)。各馆下设宣教、文娱、服务、总务等四组(股),每组(股)设组(股)长一人,组员二至三人。1952 年第三文化馆撤销并分别充实第一、第二人民文化馆力量;同年 7 月,市科学普及站(1951 年 9 月成立)与第二人民文化馆合并。1959 年 1 月成立市群众艺术馆时,第一、第二人民文化馆合并为市文化馆。

人民文化馆当时的工作主要项目是:1.举办识字班和职工业余文化班;2.开设阅览室、借阅图书、组织读报组、读书会,设置文娱室,推行时事政治教育;3.组织各种文娱团体,并推动群众开展文娱活动;4.有计划地出版黑板报、壁报和举办各种展览;5.开展科普宣传;6.举办各种讲座、有线广播;7.设立服务处,解答群众询问的问题及代写书信等。

人民文化馆在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文教科(局)的领导下,配合中心,开展社会文化业务做了大量工作。当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干部,多是中、小学教师。他们通过思想改造,提高认识,热爱党,热爱党的文化事业,不怕苦,不怕累,

忘我工作。白天完成本职工作后，晚上利用业余时间到街道组织群众读报、学习，辅导群众排练秧歌舞、腰鼓舞，给职工业余学校上课及开展有线广播宣传。大家边学习边工作，都争取为人民多作奉献。本市 50 年代前期的社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开展成人、职工业余教育

这项工作早在 1949 年 12 月已开始筹办，到 1950 年 2 月 10 日办起了成人夜学班，学生达 40 余人，多是工厂的工人和街道家庭妇女。学习内容有语文（识字）、算术、音乐（唱歌）等课程。同年 8 月以后，第一文化馆开办了第一职工业余学校。10 月 4 日、5 日第二、第三职工业余学校亦相继开学上课。学校设初小班、高小班、初中班共五个班，学生均来自各校辖区的工厂、机关、单位和街道。学生中工人占 70%，家庭妇女占 20%，贫民占 10%。文化馆抽出干部下街担任夜校扫盲教员。夜校培养了不少街道干部和积极分子，后来的一些街委会主任多是从夜校学习出来的。

二、开展街道群众文化服务活动

第一人民文化馆于 1950 年 10 月间，在罗池路、中山中路创建文化服务站，每天或隔日定时派干部前往开放。随后，第二、第三人民文化馆亦在辖区内分别设点建立文化服务站。服务站采取定点与流动相结合方式进行工作，每次开放，除陈列书报杂志阅读外，还为群众免费代写书信（赠送信纸信封）、解答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协助区政府进行失业工人登记、宣传政府政策法令等。

服务工作除下街道外，在馆内还设有服务处，由宣教、服务组（股）的同志负责接待群众，帮助群众办实事。其中办理失业工人登记这项工作，尤其受到群众欢迎。

三、开展广播宣传

市人民文化馆为扩大社会文化教育，开展群众文娱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于1950年6月1日庆祝市河北商场（今市总工会大院内东北处）开业之际，从馆内（今市文联正对面）直接拉线入商场架设有线广播，同时还在五角星地段和柳侯公园门口架设有线广播。三处有线广播每日中午、黄昏同时播出，除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文艺节目外，还广播本市简讯、文艺演唱及好人好事。

同年8月以后，第二人民文化馆在市人民广播电台的协助下，开展转播宣传工作。直至1952年12月16日第二人民文化馆遭毗邻大火的波及，转播工作才被迫中断。

四、开展文娱宣传和辅导活动

1949年11月底柳州刚解放，街头出现了解放军文工团开展的秧歌舞、腰鼓舞等崭新的文艺形式活动，人民群众争先恐后地围观战士们的精彩表演。嗣后，市人民文化馆为让群众也能推广普及这种新的歌舞，立即办起培训班，由各工厂、单位、街道推荐文艺爱好者报名参加。当时在馆门前或一、三联小（今公园路小学）操场上，每日中午、晚上轮流进行基本动作训练。顿时秧歌的锣鼓声、腰鼓的鼓点声，响遍公园路一带。培训班培养了一批骨干，回基层单位后纷纷组织起秧歌队、腰鼓队，每逢节日、集会、游行，腰鼓、秧歌队锣鼓喧天，响彻龙城。

1951年春节，根据市春节文娱活动筹备会决定，于2月6日在柳侯公园举办首次秧歌、腰鼓舞表演比赛。参赛的有工厂、学校和街道的代表队，共达250余人。这次比赛，对柳州市的文娱活动起到了普及与提高的促进作用。

50年代初期，经过文化馆进行发动、辅导等工作，全市文艺队伍不断壮大发展，出现了如市文艺巡回演出队、业余歌舞团、彩调队、粤剧队、桂剧队、合唱队、话剧队和街道组织的谷埠桂剧社、红旗京剧社、前进京剧社、红星京

剧社、春秋文场研究社、大众文场研究社、盲艺人演唱队等一批业余文艺队伍，推动了全市社会文化工作的开展，取得良好的成绩。

1953年和1956年，广西省先后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民间文艺观摩会演。柳州市以春秋文场研究社成员为主组成的代表队，参加了第一届民间观摩文艺会演。演出的节目《西湖借伞》获大会节目奖，韦成勋编唱的《抗美援朝》（山歌）获个人优秀奖，罗纯华、沈善文获演奏个人奖。第二届民间文艺观摩会演我市的《棒咚棒》（民歌）、《八音会》（高沙锣鼓）、《板凳龙》（舞蹈）获大会节目奖；李春华等三位歌手分别获表演奖、发掘奖，何秀山、罗纯华、区秀英、韦建章等7人获演员演奏奖。

柳州解放初期，一些盲艺人在鱼峰山下、江滨公园等地摆摊设点，替人算命、看相，有的盲艺人卖唱，让听众点唱旧戏文，对社会风气影响很不好。为了妥善管理，市文化馆派人下去整顿，组织盲艺人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并做文艺演唱的业务辅导，发挥其技艺专长，把他们引导到走正道、从正业的轨道，开展健康的社文活动。1952年，全市组织了盲艺人演唱队，全队共有20余人，下分3个小队。同年3至4月间，有关部门发给盲艺人演唱队外出演唱证明。他们先后到过鹿寨、雒容、柳江、宜山、来宾等县约65个村镇作营业性的演唱，先后演唱达100余场，听众达57000多人次。他们演唱的有文场、渔鼓、桂剧、彩调等文艺形式，节目内容健康，形式生动活泼。演唱活动受到群众的欢迎。因此，一些单位团体和会议，如市土产交流大会等，还邀请他们去表演。演唱活动的正常开展，他们有了收入，解决了生活问题，于是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一支队伍。盲艺人演唱队在文化宣传中取得较好的成绩，曾获得省文化局、民政局和市公安局、民政局的表扬。

五、开展黑板报文艺演唱宣传活动

黑板报文艺演唱是柳州市创办的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之一。它曾闻名区（省）内外。

黑板报最早出现于街头是在1950年6月，经人民文化馆组织创办起来的。

后来，工厂、企业、学校和街道等单位也相继办了起来。黑板报对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如清匪反霸、抗美援朝、镇反、民主改革等）、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时全市经常出版的黑板报有 90 多块，最多达到 165 块。黑板报的兴起，先是由文化馆自办 1 至 2 块作为示范，随即发动、组织和辅导各机关、团体及街道出版。文化馆作统一部署，通过文化馆牵头，组成黑板报出版委员会（群众性的），通过这一组织来作具体指导、督促和检查，黑板报出版委员会定期开办黑板报辅导班，讲授、介绍有关业务知识。每期出版的黑板报，除重大新闻稿由文化馆作统一布置外，其余稿件根据各单位的需要各自安排。文化馆常举行黑板报展览比赛，比赛分区（河南、河北）划片集中进行。如 1953 年 5 月 1 日，举办庆祝“五一”大型黑板报文艺的演唱展览比赛，河北片有 56 块，河南片有 30 块黑板报参赛。据回忆，从 1955 年 2 月至 1956 年 7 月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文化馆曾先后举办 5 次比赛，参加比赛单位的黑板报最多的一次达 114 块（单位），最少的亦达 80 块（单位），受教益群众约达 30 万人次。

黑板报采用集中分片展览演唱和讲解的办法，其特点一是规模宏大，气氛热烈，吸引群众；二是通过演唱、表演，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三是讲解和演唱板报，不管有无文化的群众，均能看懂、听懂，收效显著。

柳州市解放初期的黑板报，从开始摆着看，发展到文艺演唱；从采用单色粉笔、彩色粉笔书写，提高到采用毛笔、广告颜料色书写；从木黑板发展到白色纸板套色排版的美术形式。经过不断地总结、摸索、改革和创新，逐步提高质量，同时从活动中培养出了一批书画人才和写作人才及文艺骨干，因而越办越好。

六、举办各种展览会

在解放后的 10 年间，文化馆筹办和参与的各种大、中、小型展览达 50 余次。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展览有：“首届中小学教师画展”（1950 年），“伟大的祖国展览”（1951 年），“斗争中的越南图片展览”（1952 年），“党在过渡时

期的总路线展览”（1954年），“庆祝十月革命图片展览”（1951年11月），“列宁生平革命活动览展图片”“祖国经济建设成就图片展览”（1955年9月），“储蓄图片实物展览”（1957年9月），“节育及防病图片展览”（1958年1月），以及市科学普及站举办的“防御细菌战展览”和“月蚀展览”等共达19次之多。就其规模之大、观众面广要算“伟大祖国”“总路线”“斗争中的越南”三大展览。

“伟大祖国展览”于1951年夏、秋之际举行。市文教局派市科普站何光求同志与笔者前往南宁市文化馆联系，将其展出展品大小数百件借回柳州展出，旨在对全市人民进行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由市文教局举办，抽调文化馆、科普站约10名干部及街道数名积极分子进行对展品的修整、制作和补充。筹备就绪后于人民文化馆一、二楼展出。这是柳州解放后第一次大型展览会，每个展览室均有讲解员讲解。通过机关、单位和街道发动、组织群众前来观展。展出一周，观众达2万余人次。

“总路线展览”。1953年党中央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宣传这一总路线，于1954年夏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教局、市总工会联合在市工人俱乐部举办大型的“总路线展览”。

市党政领导部门抽人组成展览筹备委员会，统一领导、部署筹备和展出工作。整个展览分为总馆、一馆、二馆、三馆，俱乐部左侧一楼活动室均作为展览室。展出内容含全国、省、市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资料。各馆均有图、表、文、物陈列，在总馆陈列了“伟大祖国”大型的沙盘地图模型。从沙盘模型上可以直观到我国是个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国家，通过彩灯映照，山河景色动人，展览会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光辉前景，大大吸引和鼓舞了观众。展览会展出约15天，每日全天开放，观众总数达10余万人次。

“斗争中的越南图片展览”。这是一次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大型图片展览会，由柳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从1952年12月29日起至1953年1月4日结束，共展出7天，参观群众达6万余人次。

“斗争中的越南图片展览”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越南抗战前后概况，图片 100 余幅；第二，政治、经济及文化情况，图片 50 幅；第三，越南全国人民开展爱国主义竞赛运动及参加世界和平运动的资料，图片 30 余幅。此外还有越南的报纸、图书和杂志资料 30 多种。

展览会的全部展品，是由越南驻南宁领事馆提供的。领事馆派黎终始为代表及翻译潘炎两同志于 1952 年 12 月 22 日连带展品来柳指导展出。市人民政府于 26 日组成“斗争中的越南图片展览”筹备会，会长是魏伯市长。筹备会设组织、设计、宣传、展览、总务和警卫五个组。经过三天的紧张准备后，于同月 29 日上午在第一人民文化馆预展，由副市长高天骥主持开幕剪彩仪式，各机关领导陪同参观。当天中午正式展出。

展览会门前（公园路）搭建起一座青松彩门，张灯结彩，列队入场参观的观众及门前围观的群众站满公园路地段，盛况空前。

这次展览由文教局抽调本局 4 人，第一、第二、第三人民文化馆 18 人，师资训练班 51 人，簿记人员训练班 92 人，街道教师和群众 34 人，其他 6 人，合计全部工作人员、讲解员 205 人。在展出期间，全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各种宣传报道活动。

在筹备和展出中得到越南朋友黎终始同志的具体指导，他向笔者和何光求等同志赠送了越南人民敬爱的领袖胡志明主席的照片，作为友谊纪念。

试谈刘三姐在柳州

覃桂清

有关歌仙刘三姐的文献，较早见于广东省阳春县春湾镇铜石岩（因岩内有铜矿得名，后改名通真岩）。岩内摩崖刻有“乾化乙亥重阳日刘仙三姐歌台”。乾化乙亥，即残唐五代的后梁乾化五年（公元915年）。

据《阳春县志》第59页载：“铜石岩一名通真岩，在城北八十里，思良都岩有石室，高有三、四丈，深有丈余。相传唐时有刘三妹于此飞升，歌台故迹亦在焉。”府志（指《浔州府志》）云：宋真宗咸平初赐太宗御书藏于石室，御书“通真岩”三字，是由于刘三妹在此飞升。据《说文解字》云：“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意思说刘三妹在这里变形登天。清朝宣统元年，阳春县知事郑业崇把“通真岩”三字书写刻在岩口，至今犹存。

阳春县春湾镇民间传说，刘三姐原是广西人，受财主压迫，流浪他乡，两兄妹撑竹排沿江到广东阳春，顺流阳江到春湾，看见此地风景好，和广西差不多，找来找去，找得铜石岩安居。铜石岩从隋朝开始建庙宇，有和尚主持，到现在已有1300多年历史。原写“铜石古迹”在头门，北宋真宗皇帝题“通真岩”三字后，第二层门叫通真岩。原来上面有庙宇，亭台楼阁，由山脚有几百级石阶铺到庙门（可惜后来庙宇和石阶被拆毁）。

春湾民间还传说，通真岩内刘三姐歌台的石头很光滑（笔者亲眼看到，歌台石头的确很光滑）。据说是刘三姐和歌伴们坐滑的。歌台旁边有织麻篮，有个麻碗滴水浸麻，麻篮上写“清道光年才没水，以前常年有水”。麻碗边写有“道光失火”。传说刘三姐是仙人，过去通真岩有她的塑像。用木雕加油彩，如真人一样，室内有纱罗帐盖住三姐神像。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八《三妹山》条）：“刘三妹，春州（即广东省阳春县）人，坐于岩之上，因名”（据清道光二十九年即1849年慎盈斋刻本）。1990年阳春县文化馆李文光的《阳春有无刘三妹》（载《岭南民俗》

1990 年第四、五期合刊) 中说, 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普查中发现, 离阳春县城约 5 公里的新云和扶民村交界处马安山坳过三个山头, 就是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中所说“三妹山”。

从以上所引唐末、北宋到南宋时期有关刘三姐的文献资料, 足以证实在我 国历史上曾有刘三姐其人。

刘三姐在柳州的文献和传说, 首先见于《宜山县志》: “刘三妹, 相传唐时下枧村壮女, 性爱唱歌。其兄恶之, 与登近河崖砍柴, 三妹身在崖外, 手攀一藤, 其兄将藤砍断, 三妹落水, 流至梧州, 州民捞起立庙祀之, 号为龙母, 甚灵验。”妹, 壮语音, 即妹。文中虽未讲到柳州, 而宜山在柳州之上, 梧州在柳州之下, 宜山龙江流入柳江, 经过柳州, 后到梧州。这就明显地说出刘三姐流经柳州这一事实。当地流传的民间传说可进一步证实。

1958 年邓丙兴口述, 邓建业记录的《刘三姐传说》, 说刘三姐在罗城唱歌气死财主仔, 被迫搬到宜山下枧村住后, 家里怕唱山歌惹祸, 不让她上山, 留在家挑水洗衣。广东台山三个书生撑三船歌书来和三姐对唱。唱了三天三夜, 两个书生答不出, 气得跳下河。剩下一个陶书生, 后驶到柳州, 跟三姐进鲤鱼岩, 三姐在岩里唱歌成佛。

叙事歌《歌仙刘三姐》, 叙唱三姐世居罗城县古立村, 三代务农。三姐唱歌到宜山下枧村, 与哥哥砍柴度日, 财主挑唆其兄制止三姐唱歌, 三姐不从, 哥哥铺床拦门睡, 三姐半夜溜出去, 哥哥气愤, 砍藤害三姐, 三姐漂流到柳州。哥到鱼峰山找三姐, 三姐成仙升天。此长歌由宜山县仫佬族彩调老人吴老年唱, 罗茂坤、肖舟整理(《广西壮族文学资料》1960 年编印)。

笔者于 1986 年访问了在柳州黄村的 78 岁老歌手谭三, 据说, 三姐的哥哥怕她唱歌惹祸, 千方百计阻拦, 三姐仍不听从。后来, 当三姐去砍柴, 坐在下枧河边悬崖的葡萄藤上唱歌时, 哥哥把藤砍断, 刘三姐和断藤一起掉下河里。这时下枧河正涨大水, 山洪把刘三姐冲走了, 葡萄藤卷成一个大圈圈, 托住昏迷不醒的三姐, 从下枧河流下龙江, 再从龙江漂到柳江。

一位老渔翁在柳江撒网, 突然发觉网很沉, 以为得了大鱼, 谁知用力拉起一看, 网里有一具葡萄藤托住的女尸。老渔翁感到不吉利, 忙把尸体放进河里,

然后到上游去拉网。说也奇怪，再拉起网时，发现那女尸又在网里，老渔翁火了，再到滩头上去，谁知在滩头拉网，捞起的还是那具葡萄藤托住的女尸。老渔翁心想，俗话说，好事不过三，这具女尸，居然逆流而上，连连三次进网，其中必有缘故。于是便把女尸抱上河岸，果然发觉女尸并未僵硬，好像还有一丝气息，便精心救护，两袋烟的工夫，昏迷的姑娘就慢慢苏醒。经盘问，原来这落难姑娘，就是久闻大名的刘三姐，真是三生有幸。三姐感激老渔翁救命之恩，拜为义父。渔翁扶起三姐，带回食潭村家居住。从此父女相依为命，老渔翁打鱼，三姐织麻补网。刘三姐白天在鱼峰山下小龙潭边和姐妹们织麻补网唱山歌，晚上便到鲤鱼岩里和后生们对歌。

20年代，广西象县民俗学者刘策奇（他是象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时已成为烈士），他曾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一则关于刘三姐的传说，该文前部，写述柳州立鱼峰之情景，下部即介绍象县所流传之三姐故事，转述如下：

“传闻刘三姐，系广东潮梅人，有唱歌天才，走遍两粤，不获一对手。后至立鱼峰，遇一农夫，与之对唱，一直唱过三年又三月，三姐似不支，心中一急，呆然化为石像。农夫瞧瞧，叹息一声，悠然逝去。”（载《歌谣》周刊，第82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

据柳州彩调剧《刘三姐》剧作者曾昭文同志说，在清朝时，柳州百姓为纪念歌仙，曾在立鱼峰半山上立有刘三姐神像，后来在一次火灾中神像被烧毁。民国初年，又请湖南衡阳的一位师傅，再用石雕刘三姐神像，安置在鲤鱼岩里，神像旁边还塑一个麻篮。笔者1946年在柳州高中读书时，逛立鱼峰时曾亲眼看过鲤鱼岩中的刘三姐神像及麻篮，可惜此神像于50年代被毁了。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钟敬文教授于1928年发表的《几则关于刘三妹故事材料》的②“明允题刘三姐遗像诗”说“本年（指1928年。覃注）学生杂志上，载有明允君题刘三姐遗像（在鲤鱼岩后山）诗云：‘艳事说三姐，风流百代香，娇名惊牧竖，听价是歌王，丰度翩然活，遗腔唱未忘。至今岩外鸟，啼叫仿姑娘。’（注云：刘三姐，为黔桂古代善歌者，其风流轶事，至今传述未衰，乡俗最流行的山歌，有‘唱歌好，唱歌得要又得玩，不信你看刘三姐，唱歌得坐鲤鱼岩’之句，歌慕醉心，可谓至矣。）陆次云峒谿纤志余载此事甚详，

唯以刘三姐为刘三妹，名小异。”

以上的文献和民间传说，都说刘三姐漂流到柳州后，在立鱼峰（今叫鱼峰山）唱歌成仙，骑鱼上青天。至于柳州在什么时候开始有刘三姐传说，以上材料没有说明。《宜山县志》虽说到刘三姐是唐时下枧村壮女，但并未说唐时刘三姐到柳州，再从唐朝时柳州历史，以及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游历山水，题咏柳州的诗文中，都没有提到刘三姐及其传说。宋范成大著的《桂海虞衡志·志岩洞》载：“白龙洞，有南溪半地半山中。龛有大石屋，由屋右壁入洞，行半途，有小石室。刘仙岩，在白龙洞之阳，仙人刘志远所居也。华景洞，高广为十间屋，洞亦然。水月洞，在宜山之麓，其半枕江……”宜山附近有名的岩洞都提到了，连仙人刘志远所住的刘仙岩也记下了，而白龙洞中的刘三姐神像却只字未提。距白龙洞七八里的下枧村，是刘三姐的家乡，也没有带一笔。

该书紧接着记柳州立鱼峰：“……立鱼峰，在西山后，雄伟高峻如植立一鱼。余峰甚多，皆苍石刻削。”这里对立鱼峰鲤鱼岩有刘三姐塑像和刘三姐骑鱼上天成歌仙的事也只字未提。这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作者忽略了；另一种是当时在宜山、柳州还未有刘三姐故事流传。

到底什么时候柳州开始有刘三姐传说流传呢？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认为是在明朝时期，其依据有如下几点：

(1) 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文献和民间传说，尚未发现唐宋时代刘三姐到柳州活动的文字记载和民间传说。

(2) 从地理条件和民间传说流行情况看，宜山、柳州、梧州同是珠江中上游，与龙江、柳江、西江相连，因而有关刘三姐传说也很自然地形成一组相关联的故事，如说刘三姐被割藤落下枧河，流入龙江，再流下柳江，后漂流至梧州，被州民捞起立庙祀之，号为龙母。

宜山、柳州、梧州三地既然由于同饮一江水而形成刘三姐传说的一组故事群，这些刘三姐传说何时流传，可以从这组传说去寻找。据《苍梧县志》载：“传说刘三娘（笔者认为即刘三姐）是须罗乡人，生于明末上巳日。”从而得知苍梧（今梧州）的刘三姐是明朝末年出生，因为她的传说也就在明朝才流传的，因而与梧州同一组故事群的柳州，有关刘三姐传说也很可能是明朝时候才流传的。这个推测不知当否，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忆壮族老山歌手韦成勋

张绍伯 于辉云

壮族老山歌手韦成勋，马平县（今柳州市）人，生于公元1898年，卒于1983年，享年85岁。他家境贫寒，7岁时就帮地主看牛糊口。他从小就有一股“昂气”，同辈惯称他“韦志昂”，晚辈称他“老昂叔”。

韦成勋在郊区下白沙村帮一地主家看牛，与看牛娃仔为伍唱山歌，就数他的山歌来得快，且还能随口对答。他常唱山歌反地主。有一年，在隆冬季节的一天下午，他在岭坡上放牛，忽遇一场狂风暴雨，牛群惊跑四散，直到傍晚才把牛群赶回家。韦成勋又冷又饿，刚踏进地主家门槛，地主便叫他前来服侍。老地主知道他爱唱山歌，怀恨在心，便故作阴阳怪气地用山歌来讥弄凌辱他，唱道：

看牛娃仔嘴尖尖，
点个火柴爷吃烟；
听话给你钱半个，
不听给你两脚尖。

韦成勋一听，又气又急，不但不点烟，还当即以歌还击，唱道：

看牛娃仔嘴是尖，
嘴唱山歌出火烟，
哪个敢打唱歌仔，
烧你魂落百把年。

歌声刚停，那地主的猫胡子一翘，拎起一根石山柴就往他头上身上抽打。韦成勋更气愤，他明知地主恨他唱山歌，于是偏要冲着地主唱道：

廊檐滴水流成河，
穷人眼泪就是歌，
穷人受苦歌满肚，

那个敢禁我唱歌。

韦成勋不愿忍受地主的欺凌，那年，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地主家，回去开荒种菜。白天勤快劳动，晚上空闲就邀请邻近的歌友在一起唱山歌，诉穷人的苦情，唱旧社会的不平。

柳州解放后，韦成勋一家得了翻身。他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社会，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解放初他就主动到市文化馆要求参加宣传工作。1951年郊区进行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时，市文艺工作团为配合土改宣传，编了一出山歌剧《门板》，请韦成勋到团里教唱山歌。他非常高兴，说：“过去在旧社会，我唱山歌被地主打，今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鼓励我们唱山歌，我一定尽我的能力教。”说罢很高兴地随口唱道：

讲唱山歌我高兴，
我爱唱歌表心情；
今日翻身得解放，
党是救命大恩人。

从此，不论在鱼峰山上、柳江河边还是在街道、舞台上都有他歌唱共产党、歌唱新社会的歌声：

太阳出来闪金光，
翻身全靠共产党；
柳江河水流不尽，
党的恩情长又长。

太阳出来红彤彤，
照得祖国遍地红；
党的恩情唱不尽，
人民当了主人翁。

1952年2月底，54岁的韦成勋获得参加市文艺代表队到广西省第一届民间文艺汇演大会去演出。他上台随编随唱了抗美援朝山歌14首，受到大会的好评，荣获个人演唱优秀奖。其中2首是：

中朝本是兄弟邦，
只隔一条鸭绿江；
你帮我打日本鬼，
我帮你打美国狼。

雄赳起来气昂昂，
抗美援朝理应当；
抗美赶走美国鬼，
援朝就是保家乡。

他用自己的山歌，进行各方面的宣传。如宣传拥军优属：

拥军优属要认真，
爱国公约要执行；
青年参军齐踊跃，
消灭敌人保翻身。

韦成勋积极开展山歌活动，努力从事宣传工作获得很好的成绩。早在1950年他就参加了市音乐家协会成为首批会员。

韦成勋文化水平不高，但只要把党的方针政策讲解给他听，他思路一开，就能马上用山歌唱出来。当时，市文化馆把他在配合中心工作宣传唱的山歌记录下来，印发到街道和机关单位，供出黑板报用稿。他的山歌内容与人民群众生活有密切联系，又通俗易懂，如：

寒冬来了多晴天，
风高物燥火易燃，
发生火灾损失大，
个个防火保安全。

他进行计划生育宣传，唱的是：

计划生育大事情，
人民大众记在心，
这条大事做好了，

国强民富家更兴。

这些山歌，群众喜闻乐见，不少单位和街道的黑板报都采用选登。有一天他走在街上，见有人在黑板报前念他的山歌，他很高兴走过去听，后来应邀唱起山歌来。这一唱，引来不少听众。这一场面，给文化馆的同志看到后，受到很大启发。过去黑板报文章长、干巴巴，观众少，收获不大，之后，文化馆进行了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加强了对黑板报工作的辅导，使全市的黑板报有很大改进。不但写短文，而且也多采用山歌、快板等文艺形式，进而配上演唱，结合讲解。这样做非常生动活泼，观众空前增多，效果很好。这一消息传开后，受到上级的重视，中南五省份派了有关人员到柳参观。这项工作于 1956 年获得中央文化部的奖励。

一些人喊韦成勋“老昂叔”，而大多数人却称他韦伯，大家很尊敬他。因为他不但是知名的山歌手，积极开展山歌活动，而且特别热心参加社会各项宣传。在工作中不怕劳累，不讲报酬，从不要什么生活补贴。晚上工作到深夜也不领宵夜费，他的精神和风格受到群众的赞扬。韦成勋一生为柳州山歌宣传作出贡献，人民怀念他。

生活书店柳州分店的建立经过

苏尹铨

1938年元月，柳州华强书局陈经理到广州向生活书店采购图书杂志时，曾与我们讲到，柳州的同业全部是经营古籍和文具，没有经销新书和进步的书刊，学生军、青年及其他人士迫切盼望阅读进步的书刊却很难买到。为此，陈经理希望我们能早日建立生活书店柳州分店，使广大读者能在这里买到生活书店出版的马列著作和抗日救亡的各种进步读物，以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同时，他说在柳州建立分店是有条件的，主要是政治环境比其他地方好。不久，生活书店总店作了决定，派人到柳州筹备开设分店工作。

当时，广州经常遭到敌机轰炸，形势危急，广州当局通告，要求市民早日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遵照生活书店徐伯昕总经理指示，我们广州生活书店全体同仁，于1938年8月中旬，有计划有步骤分批撤退到广西柳州、南宁两地，分别进行筹备开设分店工作。我和苏锡麟等一行，携带图书行李，从水路辗转一个月之久才安全抵达柳州。当时我们的经济十分困难，但全体同仁为了完成建立柳州分店的任务，团结合作，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且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终于在市中心繁华区的培新路与兴仁巷分别租到适当的铺面、仓库和宿舍各一间，随即办理营业执照，做些简单实用的装饰，购制了书架、日常用具，挂上了招牌，这样，1938年9月10日，生活书店柳州分店正式成立了。

柳州生活书店设有门市、批发、邮购、货仓等机构。全店有5名工作人员。经营范围除本版书刊外，还兼销“读书”“新知”“开明”等版的进步图书杂志。由于马、恩、列、斯著作和抗日救亡进步读物品种多，加上开架陈列，十分方便广大顾客翻阅选购。我们发扬邹韬奋先生倡导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对顾客热情接洽，礼貌待人，态度和蔼，服务周到。开业当天，各界人士纷纷前来观看、购书，兴高采烈，门庭若市，很是热闹。此后，零售、批发营业额不断增加，有些书刊供不应求，如《战时读本》《救亡手册》《大众哲学》《群

众》《全民抗战》《世界知识》等很受读者青睐。

1938年12月，老作家胡愈之、茅盾、黄新波、秦似赴桂林途经柳州（他们都是在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和革命文学活动），曾在国民党柳江县政府礼堂召开抗战文学座谈会、报告会，深受学校师生、学生军、青年以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胡愈之亲切会见本店全体工作人员，询问工作情况，鼓励我们要认真做好书刊发行工作，发扬生活书店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优良传统，把柳州分店办得更好，作出优异成绩，争当优秀的图书发行工作者。后来在离培新路不远的庆云路，先后新建立同业的书店，有商务印书馆、上海杂志社、北新书局等5家。大家都是从事共同的业务，彼此密切联系，团结合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柳州生活书店建立后，做了大量工作，发行大量进步书刊，对于加强抗日宣传、推动抗日救亡和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海外同胞卢玉衡题诗“鬼子坳”忆奇袭

章帆

1986年10月10日，思乡情切的原国民党陆军第46军175师525团团长卢玉衡先生从香港乘飞机回到桂林，12日乘车到柳州。卢先生高兴之余，于13日和柳州市有关部门人员乘车到“鬼子坳”（即柳江县百子坳）重游战地。卢先生即兴吟诗一首《战地重游有感》：

脚蹑登车战地游，万千感慨话从头。
当年在此歼敌寇，满岭遗尸鬼哭愁。
火化风烟避迹臭，油迹隐约日中留。
可歌可泣难枚举，俯首斜阳笔亦收。
一声汽笛回头转，灯火辉煌万阁楼。

卢先生深念故土，以诗抒怀，只因他在“鬼子坳”有过一段对日作战的难忘经历。

在柳江县里高圩东面3.5公里处的一段劈山公路上，有一弯约1公里呈“之”字形的山坳叫百子坳。山坳两旁悬崖陡壁，下劈4米多深，仰望只见一线天，地势十分险要。

1945年6月15日，日本侵略军第3师团后卫第六联队数千人集结于忻城大塘圩，准备往柳州方向撤退。百子坳是必经之路。里高乡与忻城县的民军自卫队及里高圩附近群众配合国民党陆军第46军525团在百子坳准备伏击。修好工事后便分头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半山腰上，山谷和公路也四面摆阵，以构成密集火网布置。

端午之夜，大地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四周万籁无声。埋伏在半山腰的525团和民军官兵个个紧握手中枪，等待着敌军的到来。

夜11时左右，日军一排排骑兵和步兵进入了埋伏圈。这时，伏军都盼望卢玉衡团长下达攻击命令。等着，等着，信号弹仍未升上天空。

突然，二营一名士兵咳了一声，一名日军指挥官立即跳下马来，叽叽喳喳叫了几声，接着公路上的日军也随声趴倒在地。这一指挥官未发现什么动静，便爬上公路右侧的一块大石头上，四处探听，仍没发现什么声息，于是便放心大胆拉起尿来。谁知，这尿不偏不倚，正淋在埋伏草丛中的525团一位班长头上。他实在忍不住了，便“叭叭”放了两枪，敌军指挥官应声而倒，滚下了公路。

目标暴露了，卢团长立即发出了信号，红绿各两枚信号弹飞向夜空，战斗打响了，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与山谷回声响成一片。敌军人叫马嘶，胡乱放枪开炮，乱碰乱撞，纷纷倒地。战斗直打到第二天天快亮时，日军尸体几乎摆满了这段公路。

这时525团的一部分撤往深山，另一部分转移到岩洞里。第二天出来游击时，日军却以火力掩护，把尸体拉到山谷两头火化。那天只见两边两堆烈火熊熊，“噼噼啪啪”地焚烧了整天。

战斗结束，敌人已溃不成军，残部分成几股，沿着小道狼狈逃往柳州方向。

抗日胜利后，为纪念在这山坳取得辉煌的胜利，遂把百子坳改为“鬼子坳”，并建起了一座纪念亭。亭高约5米，宽约20米，呈六角桥顶，亭前建一牌坊形门，中门上书“鬼子坳”三个大字（卢玉衡题），左右两小门分书“精忠”“报国”四字，门联为“百子忆人泪，千军万马魂”（覃连芳题）。另一副对联为“百子坳前清血债，蓬莱岛上吊孤魂”（卢玉衡题）。碑立亭中，高1.65米，宽80厘米。碑文分两部分，分别为：《鬼子坳序》《迁柳歼敌战斗经过》。抄录如下：

陆军第四十六军一七五师五二五团

鬼子坳序

此坳原名百子，今日庆得千孙，柳忻疆域，骤起抗日。本团乙酉端午，截击倭寇三千。出奇制胜，以寡敌众，前仆后继，激战三日，杀敌千人，战马二百。遗尸遍野，血流成河。火化瘴气盈空，数月犹腥。敌寇败北，特立碑以志念。

迁柳歼敌战斗经过

溯自日寇侵华，迄今八载。虽告口口口口（字迹不清）。去秋，行将崩溃，犹图孤注一掷，重窜桂郡。南疆军民，奉上之命，本团通令歼敌于迁柳之间。众将士浴血歼敌战果：

五月二十九日，团开始向石陵、迁江二地进发，跟踪追击，争夺激战，凡四昼夜。官兵用命，奋力争取战斗时机，绕石陵，守迁江，北经红河，扫荡残敌，歼灭日冠四百，战马三十。我官兵阵亡四十八，伤七十三。

团扫清迁敌后，即向柳州急进，抵思练，侦知由迁江、宜山败退之敌约三千，战车四辆，野炮四门，纠集大塘附近，均为战败残敌。决以全力绕道北荡，进出里高、三都沿线。六月十六日，于门头、百子坳、牛屎坳三段伏击围敌三日，反复袭击，歼敌二百余，俘马若干，战利品无数。祭则向英灵，我军阵亡官九，士兵二十。

我军阵亡名单（因字小刻浅，年久磨光无迹）。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立

此材料据 1990 年《黄埔》十二期蒙献明撰写《夜战百子坳》一文和笔者采集的资料综合整理。

抗日烽火中的柳州广西学生军

罗怡林

我看了柳州电视台和广西电视台连续播放的《龙城恋》，其中曾出现两张广西学生军在华中抗日战场上的照片，一张是第一队全体同学在抗日前线上的合影，背景是广西学生军的军徽——铁拳周围闪出火红的血花。那是《广西学生军军歌》中“我们是铁打的一群，在伟大的时代里负起伟大的使命……”歌词的象征。所以人们称广西学生军为“铁打的一群”或“铁群”。另一张照片是我们 26 位同学于 52 年前在湖北襄樊隆中汉诸葛丞相武侯祠的留影，背景是武侯祠的大门，右边写着“杀日寇”，左边写着“拿汉奸”共 6 个大字，是赵森禄同学写的。这是准备束装待发，参加随枣会战前的留影。另外，在柳州电视台播放的《柳江巨澜》中也出现过一张我们在武侯祠留影的照片。半个世纪过去了，广西人民没有忘记喋血抗战的广西学生军。广西学生军中有 50 多位柳州人，他们也曾参加过北上抗日。

半个世纪前照的这两张照片，今天出现在家乡的电视荧屏上，我看后倍感亲切，感慨万千。当年北上抗日的柳州 50 多位同学，有的光荣牺牲了，有的病逝了，有的尚在外地工作，在柳州尚健在的只有 3 人。但在两张照片中只有我 1 人了。

看着这两张照片，使我回忆起 50 多年前在战火纷飞抗日战场上的往事。

—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8 月 13 日淞沪抗战爆发，我国对日本侵略军开展全面抗战。9 月，国民党军委将精锐的第 7 军和第 31 军数万将士开赴淞沪战场对日作战。同时，广西当局在邕、桂、柳、梧四市招考男女青年学生，以组成广西学生军，报考的有三四千人，只录取了约 300 人，都是已毕业和在

校的男女青年学生。其中有国外归来的华侨如李荣康；有同胞姐妹如蒋中琳和蒋定榕、范震和范琼、李剑芳和李剑震；有新婚伉俪如李奇斗和吕菊芬，还有未达到入伍年龄而坚决要求入伍的王中琦和徐树鸾……广西大学学生 40 多人和国防艺术社队员 20 多人也在其中。在学生军中，大学生占 20%，高中生占 30%，初中生占 50%，大致男女各占一半。我们柳州市获录取的学生有 50 多人，绝大多数是广西省立柳州中学（今柳州高中）的学生，大家都具有好儿女当报国仇的志气，抱着宁死不屈、不怕牺牲的决心，因而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抗日战场。

11 月初一，全省学生军在桂林李家村集中训练，称为广西学生军大队，大队长蒋元，大队附黄芝刚，政治指导员苏锦元，戏剧指导员万籁天，音乐教官刘延年，还设有副官、军需、文书、司号、炊事、运输兵等人员配备。大队下属男女各一个中队，各有队长和队附。

军事训练的内容是学习防空、防奸知识，训练射击技能及急行军、强行军、夜行军、野外演习等。女学生军还加学战地救护常识。

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开展宣传、动员、组织、训练群众参加抗日。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邹韬奋、钱俊瑞、金仲华、张仲实、陈天柱、沈兹九、杨秀英、沈绿漪等都曾到李家村来看望我们并向我们作报告。他们语重心长地讲解全民抗战和抗战必胜的道理，批判汉奸卖国贼的亡国论调，提高了我们对抗战的认识，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学生军分组开展各种宣传活动，有文字宣传组、口头宣传组、漫画组、歌咏队、演剧队等。军部根据各人的特长或爱好，分配到各组、队去学习和工作。广西学生军是一支半武装的部队，每班配备有德造自来得手枪几支。既是抗日的战斗队，又是抗日的政治工作队。

二

1937 年 12 月 12 日，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如妇女抗敌后援会、学生抗敌后援会和国防艺术社等组织，在省府礼堂联合举行欢送广西学生军出发大会，到会

的还有桂林市中等学校学生 4000 多人。李宗仁夫人郭德洁为大会主席。会上，她先致欢送词，接着夏威、黄旭初讲话，随后各界人士向学生军献上“出奇制胜”“杀敌锄奸”“为民先锋”锦旗三面，并赠李文创作词、陆华柏谱曲的《广西学生军军歌》一首。

12月4日，广西学生军出发了。清晨，在桂林女中门前，我们与亲属、同学、挚友依依话别，随即到桂林公共体育场，参加有2万多名群众的欢送仪式，然后向北门出发。从市中心直到北门外乌金铺的“十里长亭”，马路两旁都站有欢送的人群。机关、学校、商店、居民住宅都悬旗致敬。战歌声、口号声、乐曲声、鞭炮声汇成一首抗日救亡的战斗交响曲，响彻云霄。

离开桂林前，广西学生军发出了《告广西同胞书》《告别广西同学书》《告全国同胞书》，表达了誓死抗战、驱逐日本侵略军的决心和信心。

12月13日南京沦陷。14日，我们出征北上，途经灵川、全州、零陵、祁阳、衡阳等地。路过零陵这个小县城时，竟有几万群众夹道迎送，老百姓给我们赠送锦旗，燃放鞭炮为我们壮行，很多群众激动得流下热泪。我们每经一县、市，不顾疲劳，就按原编的组、队开展宣传活动，以增强群众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

12月28日，我们到达武汉，驻扎在武昌蛇山公园的“抱冰堂”中。这里已是千里冰封严寒之地，而我们仅是内穿毛绒衣、外穿单军衣。大家握紧拳头，冒着严寒，大步行进。

当时平、津、京、沪已经沦陷，国民党中央政府各部门均已迁来武汉。武汉已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武汉三镇到处是抗战的大标语：“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我们一到武汉便到汉口、汉阳、武昌开展宣传活动。在街头演讲抗战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道理，还唱救亡歌曲、出墙报、演话剧、贴漫画……汇入了抗日救亡战斗的洪流。

郭沫若同志代表军委会政治部向学生军献旗并演讲，当他称我们为“勇士”时，当即激起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冯玉祥将军当时不在武汉，却特意令人赠给

学生军每人一盒礼饼，盒上面写着“赠给广西来的民族革命青年”等字样，表达了冯将军爱护关怀和鼓励我们的一片心意。

三

当时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期，团结抗战气氛浓厚热烈。白崇禧请了国共两党重要人物和社会名流对学生军作报告。请来作报告的有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王若飞、王明、博古、聂鹤亭、贺衷寒、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王造时、杜重远、邓初民、马哲民等。他们演讲了10多天，地点都是在抱冰堂门前，内容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军民的政治工作》《游击战术》《如何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全民抗战》……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亲自到抱冰堂看望学生军，嘘寒问暖，还嘱咐大、中队领导要多关心我们这些到前线来工作的男女学生军。白崇禧将军也给我们作了一次报告。

在武汉，我们参加过几次抗敌救亡活动和慰劳重伤员活动。一次是参加全国抗敌后援总会和武汉分会组织的20多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保卫大武汉”抗敌示威大游行。我们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广西学生军走在队伍前面，著名的抗敌救亡爱国人士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王造时、杜重远、钱俊瑞、张志和、田汉、王立明等走在学生军后面。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大军沿着大街前进，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自卫歌》《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成千上万的群众夹道呼应，口号声、军歌声、军乐声、锣鼓声、鞭炮声汇成一片。

另一次是参加武汉人民献金抗敌活动。郭沫若同志发起武汉人民献金抗敌活动，我们学生军男女同学全部出动，各组队采取各种宣传形式，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到底的重大意义。我画了一张宣传画，画面是千百只手将金银首饰、光洋、法币投入献金箱，箱下的洞口就化作子弹、炮弹射向狼狈逃窜的日本侵略军。我们分散在各大街要道口的献金台上，接待来献金的群众并造册登记。捐献的人很多，忙得我们连饭都顾不上吃。献金的人员中有献金戒指、

金耳环的，还有献金手镯、银手镯的，也有献光洋和法币的，有的连收据也不要就走了。连那些每日三餐温饱也顾不上的蹬三轮车和拉黄包车的穷人们也献上几元光洋或法币。郭沫若同志在一次演讲中说，这次献金活动取得巨大的成绩，出我们意料之外，比我们原先估计的捐数多了几倍，这有力地说明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再一次是慰劳八桂子弟兵重伤员。我们来到武昌第八重伤医院慰劳从淞沪战场上负重伤下来的八桂子弟兵，他们见到我们刚从家乡来，又将赴前线，非常高兴。他们忘了伤痛，纷纷询问家乡和前线的情况，我们都和他们——畅谈。他们虽然身负重伤，但却关心着抗战的前途和怀念家乡父老。

在这医院里我遇见了柳州中学的女同学陈朝惠，她是这里的女护士。据她说，她和几位柳中同学也是自己申请北上抗日的，有的已分配到前线去了。

1938年春节后不久，我们从汉口出发，经信阳、潢川、商城、六安、寿县，到达最前线的田家庵。每经一地，我们都按原编的组、队开展宣传活动。

田家庵是第31军的驻地，隔河对岸就是日军占领的阵地。我们头一天到达，就驻扎在街上。第二天，河对岸的日本兵就向田家庵发射了几十发炮弹，炸毁很多房屋。我们同学有的进了掩蔽部，有的跑到野外，幸好无一受伤。陈守善同学风趣地说：“鬼子的消息真灵通呀，我们一到，就放礼炮欢迎，还超过21响呢，真是最高礼遇了！”我们接连几天下到连队去慰问我们八桂的子弟兵。官兵们见我们来到战壕里，像见到自己亲人一样欢喜，都热烈鼓掌欢迎，大家问起家乡的情况，还说，看到你们学生哥和女妹仔都来前线打日本鬼子了，我们抗日的决心更大了，不打败鬼子誓不回广西！

不久，我们南下去合肥，沿途慰问驻防这一线的广西子弟兵第7军。到合肥后奉令将大队分为两个队：第一队到六安，归第11集团军李品仙部指挥；第二队留在合肥，归第21集团军廖磊部指挥。我是分在第一队的，以后再也没有和二队同学见面了。柳州的50多位同学也在这时分开了。

第一队到了六安，又分成4个组到阜阳、立煌、霍山等县去做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抗日的工作。我是到霍山去的，我们这组没有一个是国防剧社的队员，二三十个同学也没有一个是上过舞台演戏的。但为了宣传需要，同学们集体导

演、排练抗日话剧《东北的一角》，同学们硬要我饰日本军官松本，排练了两三天，就正式演出了。当演到松本调戏菱儿，双手抱住菱儿要亲吻侮辱并说“花姑娘大大的好”的时候，后台冲出许多男女“农民”用棍棒打“松本”，将我捆绑跪在地上。台下成千的观众高声呼喊：“打死他！打死他！”全靠闭幕快才收场，不然，我挨更多的棍棒。

四

几经转战，我们经河南到达鄂东的浠水，这里的街道房屋被敌机炸得不成样子，我们只好驻扎在郊外。这时正是保卫大武汉的外围战，战况激烈，听说黄梅、广济之战我军打了胜仗，我们挺高兴。谁知队长通知我：“你立即赶到广济槽河镇去通知那几个同学，明天清晨就撤回浠水来。”还说：“如果我们走了，就尽快赶到黄陂去集中。”这时已近中午，走得再快，也要半夜才到。人急智生，我走到两山之间的一座陡坡时，恰好有一辆空的军车开来，趁它爬坡时我就爬上车去，司机见我背着手枪，又挂着手榴弹，不敢喊我下车。这样，我就搭了“霸王车”到了槽河镇。正好第二队的陈守善（柳州人）几个同学也在这里工作，他们也是奉命撤回安徽的。第二天清晨，我们就分别赶路，回到浠水时，队部已经开走了，我们急忙追赶，终于追上队部。到达黄陂，正是敌机轰炸过后，炸毁了十几间房屋，十几具尸体血肉模糊躺在屋边路上，仍未收殓，炸死的全是老百姓。日寇的凶恶残暴使我们心中仇恨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

这时，我们才知道，日军已经逼近武汉市，全市已经紧急大疏散了。我们改道经孝感、应城，日夜行军，沿汉宜公路西进。到了沙洋，突围冲出日军的包围圈，继续北行到荆门。日夜行军，实在太疲劳了，准备停留休息一两天，谁知第二天还未听到空袭警报，敌机群就飞到荆门上空，狂轰滥炸。我们赶快向郊外疏散隐蔽。何异、刘佩文同学还未跑出屋外，就被敌机投弹炸中，当场牺牲了，李芳琳同学也负了伤。我们为两位光荣牺牲的女同学开了追悼会，将她们掩埋了。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就连夜出发，终于到达了五战区长官部驻地的樊城。

1938年12月，大汉奸汪精卫叛国投敌，并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这是震动国际的新闻。但国民党重庆政府不愿立即报道，直到1939年2月，消息才在全国传开。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一致声讨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滔天罪行。此时我们驻扎樊城，队部决定举行游行示威，声讨汪贼。在游行队伍中，我装扮汪贼，胸前挂着“大汉奸汪精卫”的牌子。一名女同学装扮陈璧君，胸前挂着“汉奸婆陈璧君”的牌子。由8名执手枪的同学分两旁押解着“汪精卫”游行示众。大队伍跟在后面，除全队同学外，连炊事兵、运输兵也出动了。他们拿着写有标语的三角旗，高呼口号：“打倒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该万死，遗臭万年！”“打死日本鬼子及其走狗汪精卫！”……街两旁挤满了观看的群众，有的自动跟在大队伍后面游行，有的跟着高呼口号，有的向“汪精卫”和“陈璧君”扔果皮、扔石子。游行结束回到驻地，我们两人的衣服都脏了，我的头上起了一个小包。队长说：“这种宣传形式效果真好，震动了整个樊城！”

3月，我们去到随县，枣阳前线，慰问广西子弟兵第84军驻防最前线在凌压西部的189师。一天，该师的王团长带我们20多名同学去巡视第一线阵地，在掩蔽部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河对岸的鬼子阵地，河边的房屋都被鬼子拆去了。我们巡视到八二迫击炮阵地时，要求王团长发射几炮，打击对岸的鬼子。团长当即叫连发4发炮弹，头两发试射，第三炮就打中远处的一间房屋，从望远镜可以看见穿黄军衣的鬼子从房屋跑进战壕，第四炮就不见有鬼子跑了。奇怪的是鬼子并不还击。王团长说：“有时鬼子打炮过来，我们观测不准确也不还击的。”我们在随县前线工作近两个月就奉令回枣阳集中。还未出发，突然接到紧急命令：“枣阳已发现敌踪，不能回枣阳，必须连夜出发到河南省芦头镇去。”我们走了半夜的路，又渴又饥，途经河南境内的一个大村堡，想进堡买些食品和水。里面有两个老乡轻声对我们说：“村堡里来了百多鬼子骑兵，他们见你们人多不敢出来，他们后面的队伍就快来了，你们快走吧！”我们人少，只好赶快离开。黎明到达芦头镇附近，正准备休息，突然对面山上的敌人向我们开炮开枪，猛烈射击。同行的川军还带着骑驴子的家眷，目标大，被敌人的炮弹炸得血肉横飞。川军部队也占领阵地予以还击，敌人不敢下山来。我们分散突围，一气跑了10

多公里，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了南阳，经镇平到内乡，一路上我们还收容了几十个打散了的广西士兵。内乡是所谓“豫西王”刘廷芳的老巢，他的部下要缴我们的枪，几经交涉，知道我们是李宗仁部下的男女学生军，不仅不缴枪，还派一位参谋长来慰问我们，并送来粮食、肉菜，表示歉意。

翌日，我们经邓县，第三天才回到五战区长官部驻地老河口，这是第二次的胜利突围。这次行军黄荣基（宾阳人）同学失踪，后来才证实是光荣牺牲了。

1939年底广西学生军第一队宣告解散，大部分同学分配到安徽敌后工作，一部分回广西工作和学习，一部分入黄埔军校。大家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参加抗日各项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忆柳州抗日游击队成立始末

董咸熙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后，大有相继举兵南侵之势。1939年3月，广西绥靖主任公署部署桂林、柳州、邕宁、梧州、玉林、百色各专区成立集训游击司令部。柳州当即成立集训游击司令部。司令部设司令1人，副司令1人，参谋长1人，参谋2人，政治部主任1人，指导员4人，助理员1人，政工队员12人，军需主任、军需各1人，副官主任、副官各1人，军医2人。司令部司令韩绍琪（上校）、副司令覃××（中校）、参谋长白斗明（中校）、政治部主任董咸熙（少校）。

司令部直属机关设1个特务大队和4个战斗队。第一大队队长覃少葵（少校），下属3个中队，集中驻扎百朋。第二大队队长黄克群（少校），下属3个中队，集中驻扎太阳村。第三大队队长廖明治，下属三个中队，集中驻扎凤山。第四大队队长韩云甫（少校），下属3个中队，集中驻扎成团。司令部和特务大队驻扎柳州中学分校（即今柳州高中），当时的柳州中学已迁往成团。

因为是集训游击队，因此4个大队均分散在乡下，以大队为单位，按照步兵操典要求进行基本训练。战术方面，以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教材。通过学习训练，要求能在不同的情况下，或化整为零，诱敌深入，围歼敌人；或钳制、扰乱、破坏，使敌人疲于奔命……在政治训练方面，主要是在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时，司令部的官兵集中起来，由政治部主任作报告；大队部的官兵集中起来，由指导员作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根据《广西日报》《柳州日报》登载的一周抗日战况和新闻报道作介绍和分析。着重批驳汉奸汪精卫的“三日亡国论”的谬论。至于每中队设一政工队员，则于平时教士兵唱抗战歌曲。

司令部原在柳州城内，但自从抗战爆发后，日机几乎天天都来骚扰柳州飞机场。1939年7月15日这天，9架日机从北海涠洲岛直飞柳州，下午2时许，

轰炸市区。在游击司令部大门右侧落下两枚各约 500 磅的炸弹，炸陷成两个坑，各宽约 5 米，深约 5 米。官兵虽然没有死伤，但为了安全，从此司令部就搬到乡下去。先是搬到中渡村刘定环（柳江县大地主）公馆，后又搬到离百朋约 2.5 公里的群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到这里既可防空，又便于去百朋圩采买。

1939 年 8 月下旬，司令部接到绥署命令，派覃副司令去衡山受训，学习叶剑英讲授的关于游击战争的课程，准备回来传授，开展游击学习训练。9 月中旬，绥署政治部召开全省政治工作会议，地点在桂林乐群社，会议时间 3 天，与会人员有各区民团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各区游击队政治部主任。我参加了会议。会议内容：一、交流政工经验，由桂林区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靳为霖介绍；二、听取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训示。在未听训示前，绥署政治部主任程思远一再交代我们要仪表端正，服装整洁，不许佩带手枪。蒋委员长是要看广西青年的代表。临去听训的早上，我们在乐群社集中，程思远率领我们到法政街委员长行辕（旧法专）礼堂，经过武装人员检查，然后依次坐成凹字形。一会儿，听到喊声“立正”，蒋介石肩披黑色大氅，头戴灰色礼帽，由行营高级将领拥戴由后面侧门进入礼堂，坐在凹字形的缺口中间。蒋讲的不是国内形势，也不是前方抗战和游击战争，而是讲新生活运动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那一套理论。

我从桂林开会回到柳州不久，在 1939 年 10 月初，司令部便接到绥署关于裁撤各地集训游击司令部的命令。命令不讲裁撤的理由，只讲有的调职。裁撤时，绝大多数官兵被拨到五战区去作补充了。我被调到柳州市民团指挥部政治部做指导员。

广西各区的抗日游击队被裁撤不到 1 个月时间，日本侵略军就迅速进军占领桂南了。我们不清楚，为何要撤销这支抗日力量。而在撤销不久，1939 年 11 月 15 日，日军南支派遣军约两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用空军掩护，在钦州附近龙门港登陆，广西驻军新 19 师被日军突然袭击，溃不成军。日军占领小董、钦州，沿邕铁路长驱直入，11 月 23 日占领南宁。柳州日益紧张起来。

我方在芷江市接受日军投降见闻

穆 岳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国民党重庆政府当即筹划受降，同时命令部队向敌占区推进。当时第六战区的任务是接收武汉、沙市、宜昌等长江中游各大城市及港口，建立武汉行辕。

8月下旬，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指定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冷欣将军（中将）为中国战区受降官，接受在华日军的投降。受降地点在湖南芷江市。芷江市是湖南省西部的一个中小城市，是当时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空军基地，驻有美国空军、炮兵、工程兵、汽车团和部分美国宪兵。

9月初的一天，在芷江机场一个简易建筑的大厅里，举行了简短的受降式。当时笔者在场。上午9点多钟，忽闻隆隆机声传来，空中即出现了4架美空军战斗机。约过5分钟，一架日本银灰色座机由东飞临机场上空，飞机两翼尖端悬挂着约5米长的白布各一条。该机两侧，各有美国战斗机两架押解其降落。飞机降落后，我方一少校参谋带着20名中、美宪兵行至舱门，令日方代表下机。查验证件后，即令其登上一部前面插有两面白旗的吉普车，在4部（前一后三）插有中、美两国国旗的宪兵吉普车押解下离开机坪。

10时许，受降式开始，主席台上摆着一张铺着蓝色桌布的长方形桌，背后紫色幕布上缀着个周围是橄榄枝的金色“V”字，象征胜利与和平。冷欣坐在桌正中，左右各4名军人（包括一个美军军官）。日方代表坐在主席台下一长椅上，面前摆有一长方形桌，铺着白布。首先由冷欣宣布，他代表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继由日方代表、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上将宣读日本天皇停战诏书及日军投降书（日方的代表中还有日本华中派遣军参谋长及一个少佐，一个上尉翻译），冷欣接过日方呈上的投降书阅过后，令其在上边签字，随即宣布受降令：

1. 所有在中国领土、领海、领空的日本各军种、兵种及一切从属人员立即

全部解除武装，作战俘处理，听候遣返（遣返集中地区及日期如附件规定）。

2. 所有在华的日军武器、弹药、装备及一切军用物资，应即清点造册入库封存，以备验收。

3. 各地区日军，必须向我最高统帅部指定并持证件的官员，办理投降、接收事宜，非指定或无证件的任何部队，官员不得擅自受降、接受，日方可拒绝其行为。

4. 日方必须给予我接收官员工作上之一切方便，并确保其安全。

5. 在我接收部队未到达之前，各地区日军可暂留部分武装维持境内的秩序安全，不许任何武装力量假借接收名义进行侵扰。

6. 日本扶植的汪伪军均按此令执行。

冷欣宣布受降令后，将命令文本交给日方，宣布受降式结束，即离席。在整个受降式进行中，岗村宁茨端坐恭听，有时频频点头，两眼阴暗，面如土色，但其一切动作严谨利落。

11时许仍由吉普车队押日方代表送到机场登机，美机4架先行升空，然后日机起飞返去。

（作者系原《扫荡报》记者）

壮村“团结路”建成的经过

覃桂林

1987年元月，在柳江县三都圩西北边距1.5公里处的乡村公路挡土墙上，用瓷瓦镶嵌成的“团结路”三个醒目大字，至今行人仍清晰可见。这段路是由三都圩通往屯甫屯、中南屯的乡村公路，说起这条“团结路”，它曾有一段坎坷历程。

1981年，三都乡中南、屯甫两屯，为争果垌山一片约60亩的地属权闹了纠纷。中南屯一些群众认为，这片山是属于中南屯管辖的，因此，在山地的石壁上写了“中南地区封山育林”几个大字。屯甫屯一些群众认为，这片山地历来划为屯甫屯，他们也在荒山石壁上写了“中共中央封山育林”的大字。而且还把对方所写的字涂掉。从此，两屯发生了矛盾，且一直解决不了。到了1983年，两屯又为此路段有一个牵涉到原来屯甫屯边的3分多菜地问题，再次引起纠纷，加深了矛盾。某一屯不给另一屯的群众由此通行，并用石头等物把路堵塞，挖坑断路。而此路段却是另一屯到三都圩的必经之路。另一屯群众则去填坑开路，双方争执互不相让。你拦我拆，你挖我填，矛盾激化到顶点时，便发生了械斗。几年来，先后以尖刀、土枪、土炮、炸药包进行械斗3次，双方群众共被打伤了10多人，路面被炸开了两个大坑，这段路几年不能通行。小学生上学受阻，群众赶三都圩被迫绕道走小路、远路，送出公粮、买回化肥无法用车子运输。有些群众原有的马车被迫出卖。两屯群众见面互不打招呼，亲戚不相往来，亲家变成了冤家，而且两屯间的摩擦时有发生。由于两屯对立，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群众怨声载道。但是，两个屯的大多数群众都有搞好团结的愿望。曾多次派代表向上级反映，要求派人来解决。可是双方的意见难以统一。甚至有人讲，就是用黄金来换，也不给对方走这条路了。问题一直延至1986年。

1986年底，自治区和柳州市组成工作队来到柳江县宣传《土地管理法》《森林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下称“两法一例”)，区市与县、乡、村共同组

成工作小组，着手解决两方矛盾。县领导亲自出来解决，召集了双方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开座谈会，举办团结学习班，共同学习和座谈党中央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和“两法一例”等政策，大家认清了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闹分裂的危害，算损失账，统一了认识，产生了搞好团结的愿望和要求。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两屯各派出代表，进行互相协商，经过多次商议，终于达成团结的协议，共同写了《协议书》。1987年元月3日，双方代表在一起聚会，握手言欢，并喝团结酒，唱团结歌，1987年元月4日，屯甫、中南两屯群众当即冒雨修筑了“团结路”，并在路边的挡土墙上，镶上“团结路”三个大字。从此，两屯的积怨消除了，团结增强了。许多群众高兴地说，今后我们要永远走“团结路”，讲团结话，做团结事，努力搞好生产，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

从此，中南、屯甫两屯群众见面有说有笑，亲戚朋友和好胜当初。大家沿着“团结路”走向美好的未来。

附：《协议书》

协议书

三都村委屯甫屯与中南屯之间，1981年春以来，因果峒山其中一片荒山权属不清，互相争议后，又对中南通往三都街的道路中间，有一段牵涉到原来屯甫屯的几分地问题，发生了矛盾，多年来矛盾一直得不到解决，阻碍了这条乡村公路的交通畅通。这不仅影响到两屯群众之间的团结，也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损害国家的利益。1986年12月18日以来，结合“两法一例”的宣传教育，区、市、县、乡政府及村委有关人员组成工作组。对两屯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多次找两屯的群众、干部谈情况，分别召开了群众代表和群众会议。1987年元月3日，又召集屯甫屯和中南屯群众代表协商。在工作组的组织指导下，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共同走富裕道路，决定于1987年元月4日，修路恢复通车。

二、为保证这条乡村公路的长治久安，损坏的这段路由乡政府组织力量修复，统一规划路边砌挡土墙，路修好后，双方命名为“团结路”。

三、中南屯要把通往果峒山的原来一孔石桥修好。

中南屯代表(签章)

(名单略)

屯甫屯代表(签章)

(名单略)

参加协议有关单位和人员(签章)

(名单略)

1987年元月3日

越南革命同盟会在柳州的成立与活动

叶瑞廷

越南革命同盟会主席阮海臣，曾经长期在中国工作。他追随过孙中山先生革命，在辛亥革命期间，参加过镇南关起义。中华民国成立后，在广州市任职，1924至1927年在黄埔军校任教。后来他到日本，与在日本的越南阮氏王朝王子阮强弟共同组织越南抗法复国党。日本侵略军于1940年在广西桂南战败，退往越南，遂将被法国废黜、由日本收养的阮强弟送回越南组织抗法复国政府。阮海臣得知后，即商请中国政府派兵送他回越南北方，联合越南同盟主席胡志明，共同组织抗法复国政府，以迎接阮强弟回国，共同抗法。由于阮海臣与蒋介石有过共事关系，蒋介石同意他的请求，1940年7月，即派出嫡系部队第54军入越。当时我在军部任上尉参谋。军部开赴中越边境，我奉命留在广西田东后方办事处工作。大约两个月后，我突然接到军长陈烈（号石经，柳城县人）的电话，说越南民族革命领袖阮海臣先生和他的秘书钟秀毅先生将到田东来，要我好好招待他们。我和钟秀毅先生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因此陈军长还指定我和钟先生协助阮先生研究、制订入越计划的补充方案。从此，我就和阮海臣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我于1940年8月在广西龙州加入越南复国党并受聘为中文秘书，后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

不久，陈烈军长因拔牙身亡，军长职务由黄维接替。黄维接任后并未入越，只将部队停留在中越边境上，也不与阮海臣继续联系。阮海臣组织抗法复国政府计划不能实现，只得临时任命农径猷、农国隆父子组织越南复国军。1940年冬，越南复国军在谅山地区与法国殖民军展开血战。但是，由于孤军作战，后援断绝，复国军被法军击溃，退到广西凭祥、龙州等地。

谅山战役失败后，阮海臣到重庆与蒋介石商讨在广西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事宜，并请蒋任革命同盟会指导员，蒋介石同意阮海臣的请求。于是，在1941年春，越南革命同盟会在柳州市鱼峰路正式成立，阮海臣先生任主席。在阮主

席领导下，分别在柳州标营和大桥开办两个越南革命干部训练班，标营班对外称“军事委员会西南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对内称“军事委员会越南革命干部训练班”，班主任先后分别由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桂林区办公室主任李济深负责；大桥班对外称“第四战区干部训练团特别训练班”，班主任是曾天节少将，副主任是叶××，两个训练班的人员，除少数是华侨外，其余均为越南人。他们毕业回国后，在反法复国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越南革命同盟会指导员代表，由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侯志明少将兼任。侯是军统人员，他把越南革命同盟会置于四战区政治部控制下，限制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活动，阮海臣曾多次向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商请解决受制于人的问题，但因张不便开罪军统，阮只得到重庆找蒋介石。蒋于1943年12月下旬下令撤销侯志明的指导员代表职务，改委张发奎为越南革命同盟会指导员代表，张派四战区办公厅主任肖文中将为驻会指导员代表办公厅主任，协助阮的工作。此后，越南革命同盟会得以放手开展活动。

胡志明主席在1942年8月由广西靖西县路过德保县的华荣乡时，被国民党乡警逮捕关押，后由四战区靖西指挥所主任邓宝珊解送到柳州窑埠第四战区政治部关押。阮海臣为了集中一切力量抗法复国，遂于1943年9月23日带领越南革命同盟会军事委员叶瑞廷和钟秀毅，到四战区政治部保领胡志明出狱。胡出狱后被推选为越南革命同盟会副主席。于是，阮、胡二公共同组织力量抗法复国。

1944年除夕，国民党军第84军军长覃连芳将军举行迎春家宴，应邀出席的有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杨东莼、四战区长官部新任参军罗志强、越桂粤边区游击总司令蔡廷锴、越南革命同盟会主席阮海臣和副主席胡志明，我和钟秀毅也作陪前往。席间，覃连芳等提出关于越南独立后的国策国体问题的一些想法，大家进行议论，胡志明副主席随即发言，他分析了当前东西方战场的形势，认为苏联战胜德国这个问题，半年内可以解决；中国和盟友美国共同作战，一年内可以打败日本，这次世界大战即将宣告结束。越南也必定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彻底打败法国殖民者而获得完全的独立，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接着，谈到独立后的国策国体问题，他说，大家提出关于越南独立后国

策国体的各种设想，可作为我们战后独立建国的参考。但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我们的公民投票来决定。在座的杨东莼、罗志强、蔡廷锴都认为越南问题由越南的领袖和人民来决定。阮海臣最后说，越南在战后要独立自由，不想依附任何大国。

1944年3月，《阵中日报》(由四战区政治部主办)记者在柳江路某处采访阮海臣，请他谈谈对越南未来组织政府的态度。阮海臣回答说：“我本人对越南领导权的取得与否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如何与胡志明团结起来，把法国殖民主义者赶出越南，恢复越南的独立和自由，并永远同中国友好合作，这是我的夙愿。我乐意做一个抗法复国的前辈愿已足矣！”阮先生的这番谈话，当年在《阵中日报》和《广西日报》发表过。一次，胡志明在云头岭阮海臣的侄女婿钟秀毅的家里，推心置腹地与阮海臣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希望阮公一如既往积极领导同盟会开展工作，他说：“看来世界大战不久就要结束，越南独立的时间已到。不管前途如何艰苦，斗争如何复杂，越南总是要独立的。希望你我合作不懈，携手前进，未来的越南领导权我不愿竞争。”当时我和黎越强、阮祥三也在场。

1944年春末，第四战区干训团特训班结业，编为第四战区战地总队。7月17日下午，我在太平西街住所邀请阮、胡二公及四战区新任参军罗志强中将及钟秀毅、杨文明、黎城强等便宴，席间谈及战地工作队到越后中国军官的安排问题，阮主席说，除已集体安排外，其他个别中国军官欢迎参加我国政府工作。胡副主席提出，除总队官员个别参加越南政府外，一律照旧供职；有自愿退职者则挽留，挽留不住就和中国政府联系，欢送回国，并给予回国生活费，不使生活无着落。谈话中，阮、胡二公对越南的前途很是乐观。8月间，总队在阮、胡二公率领下，回越南组织越南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胡志明当选为共和国主席，阮海臣当选为副主席。

我在新桂系军政体系工作十一年目睹记

潘炳煌

1936年我从广西师专毕业后被派到天保、龙州、桂林等县区民团指挥部去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广大青年热血沸腾，纷纷投身抗日。我也申请奔赴抗日前线。获得批准后就到湖北广济国民党陆军第176师师部报到，师部安排我为政训处少校科长。报到后即参加了一场阻击敌军的战斗。不久，师长又叫我到立煌县接受新任务，说是陈良佐来电调我去的。

1938年秋，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廖磊率21集团军进驻大别山，并兼任安徽省主席，李宗仁要廖磊作长期敌后游击打算。廖磊率部进驻大别山，以立煌为中心开展抗日游击，这时的大别山已陷于敌人四面包围，安徽各县十之七八被日军铁蹄践踏。廖磊虽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将领，但他尚缺少内线作战经验，为更好完成李宗仁交给他的任务，便电请李宗仁选派一名能将来当他的“孔明”先生。陈良佐在广西桂林区当民团指挥官时，本领驾于其他各区之上，因此，他便成为李宗仁目中的人选。

陈良佐一到立煌，便把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对敌的锦囊妙计向廖磊详为叙述。这赢得廖磊和李宗仁的信任。廖磊专心治理他的军事事务，把省主席的事，放心交给陈良佐办。陈良佐名为民政厅长，实则无异于省主席。

陈良佐为了迅速恢复各县行政组织，以适应抗战的需要，便在立煌创办一个有几百人规模的安徽地方政治军事干部训练团（简称地干团）。训练方式，执行军事管理。课程有世界大势、抗日理论、游击战术、地方行政组织等，授课没有课本，只有讲课纲要，讲课后，学员们在政治指导员指导下分小组讨论。学员主要招收基层行政人员，也在社会招考一部分。训练以三个月为一期。训练期满按学员成绩的优劣派往县以下当行政人员，也有一部分被分配为县政府官员。每期另选成绩优异者三两人为县长。为地干团的需要，陈良佐便以21

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的名义，电 176 师，把我从湖北广济调来立煌，任地干团少校指导员。过了一年我升为中校。

当时在立煌的党派很多，但对抗日作用不大的一些党派，倘若他们不找上门来，陈良佐则假作不知。在立煌的 CC 派对抗日没有多大帮助，但他们可以在蒋介石耳边说话，所以他们找上门要钱，陈也适当应付一下，要官也给一些。当时安徽省动员委员会和抗日演剧队戏剧六队，多是进步分子在里边活动，陈良佐叫我挤出时间常到他们那里联络感情。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是支不可多得的抗日力量，由陈良佐亲自出马，主动和他们联系。地干团开办不久，廖磊、陈良佐先后邀请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及在新四军做客的国际著名文化人士史沫特莱到地干团讲演。新四军战地工作团团长朱克清也被邀到立煌访问。陈良佐得知朱克清于 1932 年改名朱笃一，并到广西师专任教，那时我是他的学生，因此，就叫我去接待。阔别数年的师生，突然能在大别山重逢，我们感到分外亲热。朱老师赞赏我们争取到抗日前线来工作的勇气，他还特赠我几本毛泽东著的《论持久战》。作为地干团指导员的我，得到这些书觉得很宝贵，它对地干团学员的政治指导起了很大作用。

地干团训练出几千学员，放到基层行政组织去任职，基层行政组织就恢复得差不多了。但尚需进一步充实、整顿、健全。因此，陈良佐组织一个临时机构即安徽省政府视察团，负责执行这个任务。他自任团长，下分若干个视察小组。我被分到第二视察小组任组长，负责视察桐城、安庆、望江、宿松等县。视察后，对该升的、该调的、该降的人员，就偕同专员或县长磋商执行。如行不通或事件较大，则打报告给团长，由团长处理。记得在视察中我发现部队中的一些连排长到乡镇办事作风很坏，若乡镇干部办事稍不如意，则怒骂和施以拳脚，乡镇干部只得哑巴吃黄连。我视察桐城，有个干部气愤地向我汇报，说保安团某排长来要担架，因为迟误了一些，就被拳打脚踢。我走访那个排长，他还气势汹汹，毫无悔改之意。“基层行政干部的社会地位如此低，如不改变作风，还谈什么充实、健全基层组织。”我加重语气向团长报告此事，团长报告廖磊，廖磊当即下令将那个排长就地枪决。消息传开，拳打脚踢行政干部的事，再也不听说了。基层行政干部，得出了一口气，积极性大大提高。

我视察安庆时，突然接到陈良佐的一个亲译密电。电报云：“我便衣队将奇袭安庆城，万事已俱备，尚待你就近设法协助。我便衣队能潜入安庆城内便大功告成。”安庆城外，湖泊繁多，日军劲旅哨所林立，检查很严，我军很难进城。就是进了城，枪响后也难出来。接电报后，我找到从立煌来的动员委员会一位姓吴的同事，和他商量，请他想办法。他在立煌时和我很友好，他有个舅舅，当伪军头目。通过他，我得以和这个伪军头目见面。我以安徽省政府视察员身份对他晓以大义，果然奏效。于是我军便衣队得以顺利潜入安庆城内。当晚城内枪声一响，城外枪声也随着响起来，响得很密。我便衣队杀死杀伤不少日军，之后，便安然返防。而城外枪声也随之停止。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回到立煌才查知，原来日军陷我武汉后，大吹长江已通行无阻。蒋介石为了粉碎日军的这个狂妄宣传，通过李宗仁，命令廖磊出支奇兵，突袭安庆。命令说，只要在城内响起枪声，不论消灭侵城日军多少，就算完成任务。21集团军一位高参接到这个任务后，感到难以完成。廖磊找陈良佐商量，陈又找新四军支队高敬亭商量。高支队驻安庆城外，与城外的日军劲旅很接近，可以设法牵住敌人。高敬亭知此缘由，主动配合。所以，后来城内枪声起，高支队便大举向驻城外日军劲旅佯攻，迫使城外日军不敢与城内配合。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廖磊派便衣队袭击安庆成功，蒋介石、李宗仁皆大欢喜。廖磊又一次尝到了团结抗日的甜头。

廖磊在陈良佐的协助下，治皖一年，大别山形成众志成城，固若金汤。日军虽然四面包围了大别山，却不敢轻举妄动。相反，日军时时刻刻都害怕我大别山奇兵袭击他们山外的据点。廖磊出色地完成了李宗仁交给的敌后长期游击任务。

1939年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阴风吹到大别山，大别山的流言蜚语满天飞。廖磊被攻击为“纵匪容匪”，是安徽赤化的罪魁祸首。李宗仁也如此埋怨廖磊，致使廖磊睡不安枕，食不知味。事实上，CC分子伸手要钱给钱，要官给官，但他们对廖磊执行李宗仁交下长期对日游击的任务没有什么帮助，反而碍手碍脚。而动委会、抗日6队，尤其是新四军，不向廖要钱、要官，却给廖帮了大忙，如果没有高支队支援，怎么能奇袭安庆成功？廖磊受了冤屈，想不通，加上其

他原因导致脑胀，以至脑溢血终而丧命。我在视察中，早已收到这些坏消息。廖磊死后，坏的消息更多。我写信回立煌向同事问讯，却如石沉大海。从此我视察工作的热情日落千丈，草草收兵，跑回立煌。这时同事们被关的关，跑的跑。一个月后得知，李品仙已来接廖磊的职务。李来后把立煌的政工人员来一次大整编，整编后保留名单上没有我。李品仙到来，陈良佐见势不妙，提出辞职回广西。在立煌的广西师专同学麦世法、刘敦安、胡承祧已被捕，未被捕的已跑到新四军那里去了。情况如此，再留在立煌没意思了。回广西又无钱，于是硬着头皮向李品仙借。递上借条，李不说借，也不说不借。当时有个负责指挥那些因战事脱离了上级的豫鄂皖边区党政机关的办事机构，我被分配到这里工作，虽升了一级，但在这个机构却无多大事可做。领导以我“病后体弱”为名，要我多休息，于是过了一年多退休般的生活。

1941年，我得知重庆方面来文，要调人到重庆政训团去受训。我活动要去，果如所愿。我办好了手续，领了赴渝旅差费，取道江西、湖南，不几天就到了桂林。我在桂林，向大别山发去一个电报，说我重病垂危，未能赴渝，从此结束了大别山生活。陈良佐回到桂林当个空头省府委员，无法帮我解决工作问题，所以在桂林闲住了一个时期。在桂林听说刘敦安、麦世法及其他尚未确知的人已被李品仙残杀了。又听说日军千把人到大别山居然如入无人之境，窜到立煌时，在立煌的机关工作人员仓皇逃命，物资损失不少。在立煌的CC分子有些来不及逃走而成了俘虏，有的下落不明。

不久，由陈良佐推荐，我到靖西专署当科长。1945年陈良佐又出任广西民政厅长，安排我为广西省政府咨议。1946年陈良佐叫我随迁江县长陈相去任迁江中学校长，从而结束了我在桂系军政体系的十一年生涯。

百岁拳师白崇晖与柳州“崇武”国术馆的建立

胡万良 胡康怡(执笔)

武术，自古以来是我国人民用之健身防身，保家卫国的手段，因此，也被称为国术。本世纪30年代，在地处南疆的柳州，白崇晖创办的“崇武”国术馆，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武术在民间的普及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白崇晖，字啸虹，柳州市人。1890年出身于回族武术世家，自幼跟随祖父练习武术和气功，还随天津石广来习太祖长拳和气功多年，后又向白焕卿、傅彦廷、曾延德三位南派名师习艺，得曾师“飞檐走壁”中的“走壁功”绝技。还习过拳击和摔跤并随太极拳家章泽群习吴式太极拳（章是吴式太极拳创始人吴鉴泉的门生，国民党少将师长），博取名家拳术之长，汲取各派拳理之精奥，独创具有特色的散打，在省内外负有盛名。

30年代初，他应南宁精武会主任陈鸿书和省民众教育馆之聘到南宁任教，后晋升为南宁精武会主任，授徒千余人。其中，弟子、精武会的助教张扬、谢耀在1936年元旦的广西第一届国术运动大会上（群众称之为擂台赛），力挫群雄，名列前茅。后来，这两个人都被聘为桂系军队的武术教官。

1937年，应家乡父老的邀请，为把武术普及到民间，白老拳师和夫人翁怜莲回到柳州，在沙街消防公所创办“崇武”国术馆。由于白崇晖夫妇精通各派武艺，教学经验丰富，前来求教的人很多。初时因师资不足，只能办两个班，学员多为工人和学生。学习内容由浅入深，第一年学潭腿、功力拳、折拳、八卦刀、五虎枪、提袍剑、单刀进枪；第二年学太祖拳、伏虎拳、螳螂拳、太极拳、双刀、双刀进枪、西洋拳和摔跤；第三年学罗汉拳、太极推手、双钩、拐刀进枪、三节棍进枪、合战、西洋拳及摔跤。白老教学态度严谨，他要求弟子练出强壮的体魄，过硬的真功夫，洗雪“东亚病夫”之耻。如他指导徒弟在月光下和黑暗里对练成功。曾子明、莫期昌等人万无一失的单刀进枪招式，就是在黑暗里练就的。先让他们在黑房子里站好位置，一声令下，便对打起来，旁人只闻紧

凑清晰的器械碰撞声和刀枪挥动呼呼的风声，如同白日演练时一样准确熟练。

此外，崇武馆还教一堂狮子，在节日里常应政府机关的邀请去作舞狮和拳术、兵器对击表演，很受欢迎和赞扬。

崇武馆至1944年止，已培养了3000多武术人才，弟子遍及到里雍、鹿寨、庆远一带，名扬两广。

1944年，柳州沦陷，崇武馆遂告停办。白崇晖带领部分弟子参加游击队抗日。当时，鬼子常三五人结伙去抢村，崇武馆师徒就在半路飞刀袭击，使得敌人不敢贸然出去抢掠，晚上龟缩市内。

解放后，白崇晖在市体委领导下，积极开展武术普及运动，跟他学艺者日益增多，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李江、陆源泉曾慕名前来，向他学习擒拿术。1983年，应广大群众要求，经市体委批准，“崇武”国术馆在柳州市重建，他被聘为该馆武术顾问，担任教练的是他的嫡传弟子胡万良、白劲草、白先忧、白先诚等。

1984年，白崇晖把长期秘而不传的优秀拳术《龙虎会》公之于众，通过胡万良整理成文发表在《体育春秋》杂志当年一、二、三期上，并在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展览会上展出，获得一致好评。

1991年，白老拳师逝世，享年百岁。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高风亮节，精深武学和“崇武”国术馆倡导的武风武德，对广西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柳州桥史话

冯光祥

早在1000多年前，柳州已形成河北、河南两个部分城区。柳宗元《柳州峒氓》诗“郡城南下接通津”指的就是窑埠码头。窑埠为当时的通津要塞，因此柳州较早的渡口要算窑埠古渡，又叫东门渡。据传于明万历年间（约公元1580年），渡口才筑成石板码头。

明代以前，柳江河两岸无浮桥。来往交通仅靠舟楫横渡。柳江的桥，有史料可查的最早出现在300多年前清代之初。顺治七年（1650）抵抗清兵的南明军队撤退到柳州，“搭浮桥于南门下”（即东门码头与窑埠码头之间）。顺治十年间（1653），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南明晋王李定国和清兵激战后，攻克柳州，也曾搭浮桥以解决军需问题。随着军事活动的结束，浮桥也无影无踪了。

乾隆二十七年（1762）典史李定业捐俸添置渡船1只，增加船夫2名，并重修码头石阶，将原码头砌宽1丈1尺，长37丈，使码头南侧在古榕的掩映和波光粼粼的映照下，显得更加壮观。

到了民国初年，旧桂系军阀林俊廷盘踞柳州，曾经强夺木材商人的木排架设浮桥，用于军需。桥头有武装军岗监守，桥头设有特大的大铁桶，老百姓过此桥要投下一两个铜板作过桥费。林军撤离柳州后，木材商收回木排，桥也随着消失了。

1929年（民国18年），随着两岸市民的增多，又在柳江架起长长的竹排桥。过往行人一多，水就浸泡鞋袜。这样的桥，稍有洪水即被冲垮，因而浮桥时有中断。

随着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的爆发，北方大批难民来柳，使市内人口猛增。部队往返频繁，军用物资调运增多，柳州商旅云集，使柳州工业暂显繁荣，南北两岸交通更为困难。如遇上敌机来骚扰和轰炸，军民无法过河南找岩洞躲避，造成许多伤亡。

为了解决渡河难的问题，由当时驻柳州的第四战区当局出面，架设两道浮桥，一道设在河南大码头，供来往行人通过（今江滨公园码头与培新路口码头之间），桥两头设亭收费；一道设在车渡码头（今华丰湾码头与对岸小南路口码头西面之间），专供车辆通过。但还是不够用。后来在窑埠码头增架一条临时浮桥，这原是供给第四战区军事使用的，但后来一般老百姓也可以通过，暂缓了南北两岸交通阻塞的紧张状况。当时这些桥是征用木材商的木筏来架设的，承受力不大，一遇空袭警报，行人密集，整条桥就往下沉，危及军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因而又改用 53 加仑油桶作浮力架桥。

以上这些浮桥，除空袭警报外，平时过桥均要收费。更麻烦的是，每到晚间至翌日零时至 2 时就要拆桥，让来往的船只通过，行船过后又要把桥合拢。遇上洪水，浮桥时有被折断和冲垮。

1943 年 5 月 30 日清晨，因洪水冲断了浮桥，一些学生、职工及做买卖的人从河南码头争先恐后地蜂拥上船，一艘小汽艇吃力地拍拖着两艇用横木扎紧的船渡江。由于驳艇超重，船身摇晃，失去重心，两艘拍拖的船，扎艇的横木又被踩断，使船倾刻翻沉，几百人落入河中，除打捞上岸外，仍有 30 多条生命葬身于浊涛恶浪之中。中正中学的生物老师廖冰清等 10 多名师生即被溺死，河岸一片哭声，情景惨不忍睹。而地方当局又未给死难者抚恤和作善后处理。事后在中正中学（今柳高新华区）开了一个追悼大会，社会各界代表一致要求惩办肇事凶手，许多龙城老者，至今记忆犹存。

柳州驻军第四战区司令部与柳州专员公署早就有筹建柳江大桥的念头。经呈报广西建设厅批准，于 1942 年 1 月由阙宗骥等人组成“柳江中正铁桥工程处筹备处”（简称桥工处），下设总务、财务、工务等组进行筹备工作。桥工处的经费由市政建设委员会拨出。当时的花捐附加款供行政办公和生活等费用。工程材料费，除上级拨款外，另发行房地产奖券。1944 年秋，柳州疏散，桥工处暂迁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日本投降后，桥工处于 1945 年 8 月又迁回柳州，并上书国民党广西省政府，要求续建。因光复后，民穷财尽，省府速复：桥工处暂时停办，并将遗下的档案、资料、测绘仪器等设施，一一造册移交柳江县政府保管。到此，柳江中正铁桥工程处筹备工作，全部宣告结束。

此外，据家住雅儒路 104 号朱兴棣（朱老 1940 年 17 岁参加铁路工作）及朱光华同志讲，国民党政府曾在抗战爆发后，于 1939 年在现柳江铁桥上游 3.5 公里处修建柳江铁路简便铁桥，用铁架、木架等器材作桥墩支架，车速限时为每小时 5 公里。接着又在同年 10 月修建半永久性铁桥（即柳江铁桥），1940 年 12 月建成，1941 年 1 月通车。1944 年 11 月 7 日晚，即柳州沦陷前 4 天，由国民党军炸毁此桥。同年 11 月 11 日柳州城乡全部被日军侵占。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出于军事需要，又从加拿大购入大批设备架设柳江铁桥。但至 1949 年柳州解放时尚未修成，只见 4 个桥墩已露出水面。

1949 年 11 月 2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北站攻入市区。溃败的国民党军队，早已在浮桥安置了炸药，正值点火引爆时，住在河南码头管理处的两名桥工，冒着生命危险，将导火线剪断，保护了浮桥，使解放军能迅速通过，顺利地解放了柳州。

柳州解放后不久，由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与柳州桥梁队合力恢复重建柳江铁桥（当时未成立柳州铁路局）。参加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及民工有 2000 多人，铁桥工程进展迅速，经几个月时间加紧施工，于 1950 年 8 月 30 日顺利完成全部工程。在铁桥的北端（今雅儒小学内）举行通车典礼，柳江铁桥的建成，使湘、桂、黔铁路能连接沟通，形成中南、西南 5 省的交通枢纽，掀开了柳州交通史的新篇章。

柳州解放前，龙城父老及各界人士也曾多次商议集资兴建柳江公路大桥，但总无法实现。

解放后仍架浮桥，市人民政府数度拨款修理，但这样简便的浮桥，只供行人通过，车辆仍要在车渡码头乘船过河，而每当洪水季节，浮桥仍时有被冲垮或折断。

60 年代初，政府拨款投资 720 多万元建设大桥，于 1968 年 12 月 26 日建成了全长 608 米的柳江大桥（一桥），使鱼峰路和龙城路衔接起来。大桥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从此结束了龙城人民千百年来过河难的岁月，促进了河两岸的兴旺发达。

紧接着市政府又投资 1800 多万元筹建河东大桥（二桥），于 1984 年 5 月完成，

全桥长 1300 米。1989 年 10 月 1 日，又建成全长 694.65 米，桥面净宽 22 米的壶东大桥（三桥），三桥东西引道长 585.35 米，整个大桥连配套的潭中大道、白沙路改造工程施工总长达 3130 米。1990 年 10 月 16 日动工兴建又一座横跨柳江的公路大桥静兰大桥。这座大桥主桥长 551.32 米，宽 16.5 米，工程造价 1225 万元，是柳州市第四座公路大桥，于 1992 年 10 月 27 日通车。

在建国后短短的 40 多年时间，建成了 4 座公路大桥，现尚有两座大桥正在兴建中。这是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和柳州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几座大桥的建成使南来北往的车辆鱼贯接踵川流不息，推动了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如今柳州呈现一片昌盛繁荣景象。

注：本文是根据我现年 90 岁的家母口述及自己耳闻目睹，并访问了当年参加建桥的有关人员，查阅有关资料写成的。

抗日战争时期一位美国人在柳州的记事

晓 韶

按：本文根据《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一书的某些章节缩编而成。该书作者为美国的画家格兰姆·贝克，具有一颗善良美好的心和强烈的正义感，他于1940年第二次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和事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后来他把这段时间的见闻撰写成书，下面是他在柳州时的经历记。

—

炎热的八月，我在柳州等车去重庆，一等就是一星期。

我住的旅馆设在近郊区。田野上，有个建筑脚手架高高耸立着。第一个清晨，天刚破晓，扩音器发出了大声叫喊：“十八架敌机到广西啦！”一阵喧闹声中，第一次警报响了，山梁悬出了一盏红灯。忽然，第二盏红灯升起，扩音器又喊道：“快！快！快！”旅客们跌跌撞撞地跑下楼，边跑边喊。

“敌机到柳州了！”扩音器隆隆在响，令人不寒而栗。山上，香烟熄灭了，阳伞折起了，孩子们叫着父母，穿白衣服的被警告要隐蔽，一切谈话都停止了。过了一会儿，敌机每三架一组，自城南飞往西方，顷刻间就不见了。

我在山谷中和两个国民党官员坐在一起，一位年轻的开始向他的同伴介绍美国——那摩天楼呀，真高呀！那大桥呀，真长啊！那隧道，好深哪……

少顷，有个小小的殡仪队在下面那空虚的城镇出现了，当一架敌机返回时，整个队伍就冲刺到山上来了，他们带着棺材和一些红绿色的仪仗幡旗。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抬棺材的苦力竟想把棺材置于活人之中，他们打趣地说，把他留在这儿吧，他不会有意见的……

我在柳州的这一周，只有一天没警报，有一天响了两次，可只有一次遭到了12架飞机的轻微轰炸。其实轰炸本身并不如人们的喧嚣那么可怕，因为轰

炸只在多次警报中来一次；而喧嚣却在每次警报中都有。每当敌机去后，山上山下，到处笑着，喧闹着，重复地问着同一个问题：

“怕不怕？”

“不怕，不怕！”

“怕一点。”

“怕，也没有办法。”回答来自儿童、老人和残疾人。

当敌机已离开后，大家欢笑地彼此从衣服上扔掉树叶，走时还摘点花朵。人群流下山，重新又占有了他们的城镇。不过，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

1945年8月，当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我又一次来到了柳州，我看到了战争留给柳州人民的痛苦和凄凉。那段时间，连绵的雨季开始了，河水泛滥，冲毁了临时性的新建桥梁，所有柳州外边的公路都被阻隔。雨季一直延续到8月中旬。原来的柳州城，现在已是一片寂静的废墟。

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许多废墟上，去年撤退时失散的家人，现在又回到了家园。可是，到处断垣残壁，破砖烂瓦。一片焦土上，房屋揭盖的揭盖，倒塌的倒塌，那杂乱无章的情景，显得分外凄凉。他们只好用粉笔写下了心酸无比的留言，重又失望地离去了。而留下这些潦草涂写的寄语，是告诉亲友怎样去找到他。一些人在碎砖破瓦堆中常能见到刚死去的亲友的尸体。因为，在这潮湿而炎热的夏季，这里既有饥荒又是霍乱流行。

我记得，1940年，这里被飞机轰炸毁坏的房子常常很快得到修复，而5年后的今天，这里虽有几处房屋和商店在修复，但进度之慢我在中国别无所见。许多新草棚建在河边的街道两侧，被洪水冲毁后，看来，人们再无勇气和精神去重建了。有一条街，满是战争毁坏的房屋，遭水灾后，从棕色的泥浆和碎片中散发出了难闻的恶臭。在近代世界史上，这是一幅最令人失望的图景啊！

战争结束前的一星期，在这侵略军造成的凄惨场地上，竟出现了一次异乎寻常的游行。在这段时期中，我最后铭记在心的一件事就是：美国舆论帮助了

国民党，作出了种种有关前线的假报导。

8月末的柳州机场，成了美军最靠东边的大机场，可以说，它成了我们在中国的航空中心。日军正式投降后没几天，几百架美国飞机从印度仓促调来，飞越驼峰和太平洋的飞机聚集柳州，以便运载国民党部队飞往沿海。大部分飞机运载士兵，也有些飞机满载官员去日占区接管城市。当这些飞机降落机场时，旅客们总要爬出飞机舱，呼吸新鲜空气。在机场小休的高级官员，大部分携带家属和佣人以及一些攀龙附凤之徒，并带着无数的行李，包括昆明火腿和满筐的重庆柑桔。

接管期间，一些官员以官职猎取钱财，向伪官吏敲诈勒索，将没收敌伪财产作为个人的战利品，蛮横地买进有利可图的私人产业，只支付一点象征性的价钱等等。这些丑恶可耻的现象，在南京特别突出。

到了8月底，即使像柳州这样的靠救济过活的城市，也开始遭受到官吏们种种滥用职权之苦。这表明国民党统治已面临绝境。9月初，我从柳州出发，沿西江直下广东，在沿河而下的途中，沿岸大地上，到处是荒芜的农田。那遗弃的乡镇和颠沛流离的人们，那遍野荒芜的情景，每天都显得格外凄凉、格外落寞……

（原载1991年7月27日、8月21日《柳州文化报》）

对《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在柳州》一文的商榷

覃仙毓

1989年6月印行的《柳州文史资料》第六辑，载《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在柳州》一文，笔者认为，有误数处，现分述商榷如下：

一、该文说柳州电灯公司“至民国16年，机量90瓦”。据查，柳州电灯公司于民国5年5月由商人合资兴办，安装48千瓦木炭发电机组1台。初期营业顺利，嗣添装40千瓦柴油发电机组1台。民国10年广西社会不安，商务凋零，公司亏损，无力经营而停业（见民国21年9月22日《南宁民国日报》和32年出版的《桂政纪实》）。以上说明柳州电灯公司在民国10年前已有两台发电机组，容量88千瓦，不是至民国16年，机量90瓦。

该文介绍柳州电厂的情况说：“该厂民国27年增装250和2万马力油炭两用机1部……”这里说的是250匹马力机1部加2万匹马力机1部，还是250匹马力原动机配2万匹马力发电机1部？讲不清楚。事实是：广西电力厂柳州分厂于民国24年5月建厂，安装200千瓦柴油发电机组1台（280匹马力柴油机配200千瓦发电机）。民国27年10月增装160千瓦油炭两用发电机组1台（250匹马力原动机配160千瓦发电机）。该机组烧柴油出力160千瓦，烧木炭出力130千瓦（见民国32年出版的《桂政纪实》《柳州电厂民国32年电气事业年报》）。

该文说柳州电厂“民国31年1月成立……筹装2千瓦透平机1部”。这里只有原动机，没有发电机。其实，不是2千瓦透平机1部，而是2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台（见柳州电厂档案）。

二、该文说，“柳州官商合办电灯公司创始民国5年，厂址设在斜阳路，厂长杨逢侣……”据查资料：柳州电灯公司创办时经理陈敬堂，董事长陈炳焜。民国10年停业。民国15年夏，广西政府建设厅厅长伍廷飏拨款派员恢复供电，称柳州电灯局，伍朝驥任局长，民国17年冬停办。民国20年驻柳第四集团军拨款复办，杨逢侣任局长，民国23年停办。柳州电灯公司，电灯局的负

责人分别称经理、局长，不称厂长（见 1990 年 9 月出版的《柳州金融志》47 页、民国 17 年 9 月 8 日《柳州各机关联合会第 16 周常会会议录》、民国 20 年 10 月 18 日《柳江农林试验场场长杨士钊宣誓就职文》）。

三、该文说，柳州电灯公司后由“建设厅长伍廷飚氏收回官办。”这是不对的。其实，柳州电灯局生产经营的固定资产是柳州电灯公司的。电灯局结束，电灯公司收回资产拍卖，电机卖给广西农事试验场抽水灌溉，配电线路卖给广西电力厂柳州分厂（见《广西电力厂柳州分厂概况》民国 30 年赵德民作）。柳州电灯公司是商人合资办的企业，伍廷飚出资派员利用该公司设备供电营业，并没有出资购货或依法没收其资产，怎么收回官办？

四、该文有一段话：“该厂民国 27 年增装 1 台 250 和 2 万马力油炭两用机 1 部，抗战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广西省政府为应需起见，联合办该厂，于民国 31 年 1 月成立……”这里说的抗日战争（民国 34 年 9 月）后联合办的柳州电厂与于民国 31 年 1 月成立的时间有矛盾，其实民国 27 年是广西电力厂柳州分厂，民国 31 年 1 月柳州电厂成立接管广西电力厂柳州分厂继续营业，同时建设新厂，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不是抗战后。

五、该文谈到柳州电灯局结束时说“……旧机由公司自行处置出售。电力厂出资 5000 元，旧公司股东出资 1800 元，付还地方了结债务。”事实应是电灯局结束，原电灯公司收回资产进行拍卖，配电线路卖给广西电力厂柳州分厂，不是电力厂出资替电灯局（或电灯公司）还债。

该文说柳州电厂 2000 千瓦机组土木工程于民国 31 年 12 月动工，应为 11 月，有奠基石为证。

更 正

《柳州文史资料》第三辑刊登《柳州三青团从组成到覆灭》一文中提到“后来担任该报唯一的女记者蓝秀珍，也是由冯培仁介绍的，这样就加强了三青团在柳州的政治实力。”经作者蒋霖进一步回忆和查实，蓝秀珍同志不是三青团员，她到柳州日报社工作也不是由冯培仁介绍的。特此更正。